

中國文化研究 通讯

Newsletter on Chinese Cultural Study

2021 年第 1 期

总第 17 期

西北大学优秀中国文化遗产与创新基地

主办 中国优秀文化传承发展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优秀文化传承创新智库

顾问

张岂之 王亚杰

郭立宏 常江

主编

李浩

执行主编

张海青 赵杭

责任编辑

陈战峰 王早娟

刘晓宇 刘晓

吴红兵

封面题字

袁行霈

◆工作简讯

中心召开“2020 年度工作总结暨 2021 年度工作规划”大会 / 2

中心参加文学院举办的首届学术年会 / 3

◆专家观点

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 刘跃进 / 4

◆序跋与书评

摩石有心,汲古无闷 / 15

“碎片”的还原与透视 / 26

◆学术平台巡礼

西北大学国际汉唐学院简介 / 36

◆学者风采

宋明文学专家——张文利 / 39

唐史及敦煌学专家——李军 / 41

◆新书推介

《李梦阳集校笺》 / 43

《京兆集——半通斋诗选二集》 / 44

中心召开 “2020 年度工作总结暨 2021 年度工作规划”大会

2021 年 1 月 14 日,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于长安校区图书馆 7 层多媒体会议中心召开“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2020 年度工作总结暨 2021 年度工作规划”会议。会议由中心副主任赵杭主持,中心主任李浩教授作了总结和汇报。西北大学文学院和校办、高人办、财务处、社科处、图书馆等职能处室的相关领导出席会议,中心成员张海青老师、刘晓宇老师、王早娟副教授、孟飞博士、任雅芳博士、陈艳博士、吴红兵博士、刘晓博士、郭琳博士、赵翊方博士参加汇报。

首先,中心成员依次汇报了各自在 2020 年度的工作情况以及取得的成绩和 2021 年度的工作计划。接着,李浩主任做了工作汇报,分别从科研成果、荣誉奖项、平台建设、学术活动、智库建

设、队伍建设等方面介绍了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2020 年度的工作情况,指出了 2020 年度工作中取得的重要进展对中心乃至学校发展的贡献,部署了中心 2021 年度工作规划。之后,参会的诸位学校职能处室的领导,肯定了中心在 2020 年度工作中取得的重要成绩,指出中心自创办以来取得的长远发展对学校 and 兄弟单位都具有借鉴意义,纷纷表态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心的各项工作。

最后,李浩教授作会议总结,要求大家以诚恳的态度、严谨的作风,认真努力做好新的一年各项工作,完成省上、学校下达的教学科研任务,以优异的成绩来回报学校对中心的期许,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中心参加文学院举办的首届学术年会

2021年1月15日,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成员参加了西北大学文学院首届学术年会。本次年会分为教研室年度学术总结汇报和学术报告两个环节。常江副校长、中心执行主任李浩教授、西北大学期刊管理中心主任刘卫平教授、学科处汪涛处长、教务处倪小勇副处长等参加了会议。文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暨全体教工90余人参加了年会。

会上,李浩教授作了专题学术报告,从汉文与粟特文双语《大唐故安优婆姨塔铭》的研究说起,

对20世纪以来的新文献的发现与新方法的引入加以梳理,提出了学术原创的原则和标准,对文学学科发展提出了建议。赵杭副主任代表中心分别向大会汇报了2020年度的科研和学术工作,并对2021年的学术研究进行了规划和展望。

常江副校长与部分相关处室的领导认真听取了工作汇报,充分肯定了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在2020年度的工作成绩,并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奋发有为,努力产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成果,为党的文化事业贡献力量。



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

刘跃进

摘要:关于文学史的研究可能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是我们为什么研究文学史? 其二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意义在哪里?研究文学史,要有三个支点,即艺术感受、文献积累、理论素养;要经历三个层次,即走进文学、走出文学、最后回归文学;而今又关涉到三个热点,即关注社会阶层的研究、物质生存的问题、强化了时空的观念。历史本身无法真实地被还原,进入历史的唯一一条途径是文献学。

关键词:文学史 文献学 历史现象

一、文学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关于文学史的研究可能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研究文学史,或者更扩大一点说,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可能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还原历史,也就是了解历史。问题是,历史能否被还原呢?我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我认为历史很难真实地被再现。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我跟对面的人吵架,这个吵架可能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很复杂,个人的原因,社会的原因。今天吵架时,双方都说各自的道理,当明天再去了解这个吵架的背景的时候,当我们俩向第三者陈述这段故事的时候,就会隐去各自最不想说的东西,都把最有利于自己的部分说出来。而第三者在陈述这段吵架的时候,为了保持公正客观的立场,他也尽量抹去细节,抓住大的东西。因此,第二天,三方关于我们吵架的陈述,就已经有歧义了。因为每一段历史、每一个人都有他各自的一套思想,各自的考虑。如果这么一件小事都很难真实地被还原,更何况是历史呢?一百年前,一千年前,甚至五千年前的这段历史,怎么来再现?

既然历史不能再现,我们又为什么要研究它?这就引出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意义在哪里呢?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凡事都不能走偏激。当一切历史都变成当代史的时候,历史就变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虚无的存在。如果是这样的话,历史的客观性又在哪里?所以,无论是想真实地再现历史,还是站在今天的立场去阐释历史,都不能走偏激。回过头来看,什么样的历史才是好的呢?有时读历史书,会觉得有的书写得真棒,真是令人拍案叫绝;有的书却只是干巴巴的几条,没有味道。有时看到好的论文,我们也会想这篇论文写得真好,而那一篇写得真糟。那么,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呢?其实这里涉及好多问题。

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学位体”。我自己也是“学位体”的产物。我也是从写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一路走过来的。所谓“学位体”通常是这样运转的:学生一进门,师生就在一起商量选题,通常先划分个时间段落,再划个空间段落,最后在特定作家作品中,或者在某种文体中选个题目。题目的依据是什么呢?通常就根据我们的文学史的常

识,然后再根据这个题目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一般地去翻材料,然后梳理成文。

其实,我们的教授也在做着类似的工作,创造一种所谓的“课题体”。这种“课题体”,往往是先确定一个题目,申请项目,再收集材料。这种研究模式基本都是如此,从选题开始,到研究方法,其实都带有鲜明的先人为主的观点。也就是说,脑子里大致都有一个结论,需要资料来论证这个结论。现在,这样的文章,这样的著作特别多。

运用这样的方法,以我们这样的智商,从先秦一路做到当代,应当没有问题。我们的历史常识,我们的文学理论知识,足以支撑这样的“研究”。拿一个题目,组织一篇文章,一点问题没有。但是,这样的研究行吗?当然,我们在收集材料和阅读材料中肯定有所感受,比如阅读当代文学,阅读一部小说,欣赏一首诗,当然有感受。但是,只是把感受的东西写出来,叫不叫研究?问题就在这里,什么叫研究?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我们现有的生产机制、生产体制下炮制出来的论文和论著,基本上是千人一面,结论也多是人所共知。这怎么办?所以,我认为现在的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还没有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层面,更多的是描述历史、描述各种历史现象,而文学史是必须建立在具体的研究基础上,但是现在我们倒过来了,基本上不管有没有过积累,都可以写一部文学史。在我看来,研究历史,研究文学史,概括起来,要有三个支点,要经历三个层次,而今又关涉到三个热点。首先,看文学研究的三个支点。一是艺术感受,二是文献积累,三是理论素养。三者缺一不可。

一个研究文学的人,如果没有艺术感觉,如

果对自己的研究对象麻木不仁,那么,他的文学研究基本就已经走到了绝路。如果让你读一千首诗,你能否在这一千首诗里挑出最感动你的诗?有的人不行。这就是感觉。每一个年轻人都有艺术感觉,都有激情,都会被感动。但为什么有的人可以从事文学创作或研究,有的人却不行,不能把感觉的东西变成真实的再现呢?这就涉及到另外两个问题,即,仅有感觉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文献的积累和理论的素养。

什么叫文献的积累?我们常说自己读书不够,理解能力不够。怎么来读呢?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80年底,罗宗强先生在我的学年论文上写了这样几个字:“跃进同学,文章看过。您悟性很好,但基础较差。”然后他又鼓励说:“这是时代之过。积之以时日,将来必将有所成就。”那个时候我就想,老师说我的基础不好,那就打基础吧。什么叫基础呢?我当时的理解就是多读书。1982年1月,我被分配到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工作。刚一报到,就一头扎进书堆里,希望打好基础。但是一年之后,我突然有了大困惑。我发现读了那么多的书,很多情况下,只是记住了一些地名和人名,或了解一个大概,仅此而已。我就想,即便我不吃不喝,把图书馆的书都读完了,又能怎么样?如果不思考,很可能就是两脚书橱。即便学富五车又算得上什么呢?尤其是现在,电子技术真是发达,一个硬盘,容纳那么多知识。用不着我去背诵,去炫耀,里面什么都有了。可见,光有文献积累和艺术感觉还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就迎来了第三个问题,它是研究文学的第三个支点,即理论的素养。我读大学的时候,老师总是教导我们说,要有理论思考,要有问题意

识。从我知道“理论”二字到今天,我一直在想,什么是理论?是否有一种立竿见影、拿来即可为我所用的理论?我是到今天也没有找到这样一种现成的理论。上个世纪 80 年代,学术研究呈现出一种看似非常活跃的局面,一时间,各种理论,狂轰乱炸,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但是,30 年下来,时过境迁,到底有多少东西留存下来了呢?看来多数所谓理论,不过是浮光掠影,水过地皮湿,并没有解决多少文学研究的实质问题。我非常关注理论,但也常被理论困扰。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是疯狂地撷取各种西方的理论书籍,不论什么,只要是西方的,就拿来读,以为总有一天能醍醐灌顶,突然开窍。但是直到今天,也没有开窍。几十年来,甚至上百年来,研究文学的人,总希望有个研究理论的人能够指引我们往哪儿走。但令人悲观的是,据说现在理论家们也在逃亡。大家都觉得理论太空疏了,所以纷纷敬而远之。问题是,搞文学史研究的人,当失去了一种理论方向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回顾 20 世纪学术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贡献最大的,或者说,推动一个时代学术潮流变化的那些学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旧的学术营垒中冲杀出来,接受了现代西方文明的洗礼,他们在新旧之间,在中西之间,寻找到自己的立脚点。譬如清华大学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都对现代西方文明有着清晰的了解。我的导师姜亮夫先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他曾对我说,王国维是最早接触《资本论》的人。我虽然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文字材料,但王国维先生读叔本华,读

尼采,且有相关的论述,确是事实。他的思想,他的观念,他的研究方法,无不浸润着现代的学术意识。从当时的学术环境看,王国维在传统学术研究方面,他的学问也许不是最大的。在某一领域,确实有很多学者术有专攻,但是,他们没有像王国维那样,成为时代的推手。这是为什么?这一点值得我们反思。这个事实告诉我们,理论思考,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强大动力。

其次,文学研究的三个层次。文学研究的三个层次,无外乎走进文学,走出文学,最后回归文学。改革开放 30 年,我们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最初是走进文学,向文学靠拢,然后再寻找走出文学的途径。现在强调学术研究综合化,于是离文学越来越远。当前有一种强大的声音,叫回归经典,回归文学。西方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西方正典》,是美国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写的。这本书罗列了西方最有名的 20 部文学经典,并作了串讲。作者在《前言》中说:“文学研究者变成了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①归结一句话,就是不懂文学,或者不愿意懂文学。这段话可能过于尖刻,但是他所指出的这种现象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其实,在中国也是如此,必须要回归经典,回归文学。学术界有一句话,叫学术研究“中国化”,指的就是要回到传统,回到经典。这里没有什么政治含义,而是时代潮流使然。

最后,再介绍当前文学研究的三个热点。第一个热点是关注社会阶层的研究。什么是阶层?

①[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412页。

其实就是人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这个社会是有阶层的,只是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或者说是在刻意回避这一点。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我们认为这个社会主要是由两个阶层构成。要么是无产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要么是资产阶级,自然是我们所反对的。而今,社会阶层发生重大变化,不再是过去的两分法,而是变成了若干个阶层,这就涉及到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我们会问:中国社会的主体是什么?执政党的依靠对象是什么?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是什么?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其实背后是深刻的社会和现实的政治问题。

有部电影叫《我叫刘跃进》,它叙述了一个小人物的遭遇,所反映的就是当前社会底层的状况。这种状况,当代文学称之为“底层写作”。其实何止是当代,现代文学的“左联”文学运动,之所以感人,并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就是因为那些左翼作家描写了底层人物的悲惨生活。如夏衍的《包身工》等,可见这个社会是有阶层的,不能回避。

只是,我们的文学史长期以来只关注一个阶层,即所谓的精英文化阶层,虽然不用这个词,实际所叙述的主要是这个阶层的文学。事实上,文学发展是多样性的,不可能只有一个阅读群体。例如我们关注曹植,阅读和介绍的,无外乎像《赠白马王彪》《送应氏》这样反映社会离乱和知识分子建功立业志向的作品。如果我们开放视野,其实在曹植创作中,还有另外一些作品,也应当纳入我们的视野。譬如《鹧雀赋》《骷髅赋》《令禽恶鸟论》等,文学史似乎从未关注。而这些作品很怪异。近年,江苏连云港地区一座汉墓出土了一篇《神鸟赋》竹简,作为一篇歌颂神鸟的俗赋,其风格更接近于今天的底层文学。此赋用拟人的手

法,讲述的是乌鸟争巢的故事,赋中雌雄乌的对话引用的全都是儒家经典。这使我想起了汉乐府中的《枯鱼过河泣》《战城南》等,也都是用动物的语言来表达人的感情。而这,正是当时下层文学的一个特点。显然,曹植的创作,多少也反映了下层文化的某些特点。

我们的文学史在写到建安文学时,总是这样说,建安文学为什么感人呢?一是它描写了时代的离乱,二是它展示了知识分子建功立业的情怀。其实,中国历史上真正统一的时间并不多,多数是处在战乱的状态,那为什么只有建安文学描写战乱就感人?还有,自从有了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谁不想建功立业?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文学事业就是立言的事业,也是追求不朽的名山事业。因此,这两个结论远远不能用来概括建安文学的成就。我觉得,建安文学之所以感人,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作家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反映了社会底层的心声。也就是说,当时的精英和下层民众在文学上达到了高度的默契。

所谓底层,所谓民间,还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事实可能要比这复杂得多。我们都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当时一些文化精英所倡导的文学改良运动。今天看来,这些倡导者具有非凡的历史作用。而在当时到底有多大影响呢?这还是一个问題。如果当时影响很大,钱玄同与刘半农何必还要扮演双簧戏呢?“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去10年之后,老百姓读的依然是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关注张恨水等作家,他们的小说几百万册地发行着,占据了当时的大部分图书市场。鲁迅日记多次记载,鲁迅的母亲借阅读张恨水小说。可见,即便是文化革命“旗手”的母亲,照例是不

读这些精英作品的,她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此外,作为一场运动,它总还有相对立的一面。当年和鲁迅作对的那些人,很多人极有学问,被极度讽刺的所谓“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中坚力量,也都不是一般的文人学者。今天,他们的资料、他们的事迹逐渐浮出水面,我们发现,这里面有着很复杂的内容,绝不是像过去所描写的那样简单。而所有这些,我们今天的文学史基本上都过滤掉了。这样,20世纪初期的文坛,似乎只有一个文化革新的潮流,而看不到更加全面的历史场景。

文学研究的第二个热点,就是物质生存的问题。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如何,直接影响到他的思想感情。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正如达尔文发现人类进化规律一样,马克思最伟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人要从一切活动,首先必须从吃喝住行做起。马克思的重要贡献在于从人类的经济活动出发去探讨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我们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之所以改革开放,就是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10年,我们的经济几乎走到崩溃边缘,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这是因为经济的力量所推动的。

在中国古代,并没有所谓专业作家,就是今天,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的作家多数在体制内生活,依然属于官场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专业作家。所谓专业作家,应当是依靠自己的稿费养活自己,有其独立的品格。在中国古代很少有这样的作家。当年,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进入长安,就是想挤进官场,然而10年落拓,“卖药都市,寄食友朋”。在他离开长安的时候,曾写下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的千古名句。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携带家小,逃亡西南。“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真实地再现了他的窘迫。如果没有艰难的经历,他怎能写出如此感人的诗篇呢?年轻的时候,杜甫也胸怀抱负,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后来却写了“但使残年饱吃饭”这样的诗句。他的人民性,对下层人民的体验,跟王维、李白等人是完全不一样的。由此可见,物质生活对一个作家生活的影响何等的大啊。因此,我们要了解一个作家,就要了解他的物质环境,生存处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读懂他的作品。

文学研究的第三个热点,就是强化了时空的观念。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事物都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发生的。文学研究的时空观念,就是把人、事、作品等放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去考察,如此才能体现出它的意义和价值。我们过去读文学史,虽然也觉得这是历史,但是又不解气,感觉到比较空泛,比较笼统。原因就是我们的研究脱离了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而今,文学编年研究、文学地理研究非常热络,原因就是 we 开始关注到这个问题,注意从纵横的坐标寻找历史兴衰的机缘。

我在编写《秦汉文学编年史》时,涉及到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序中有“唯秦八年,岁在涪滩”。我只是根据前句话,就想当然地认为这部书应编纂于秦王嬴政即位的第八年,而后句话“岁在涪滩”却未深究。根据《尔雅》,所谓涪滩,是指天干地支中的申年,是秦王嬴政即位后的第六年,不是第八年。当时我觉得,第六年也好,第八年也罢,也许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但是我后来发现,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如果是第八年,那么就意味着,吕不韦是以秦王登基作为纪年的开始;如

果是第六年,那往前推八年,就不以秦王为中心了。就在那一年的前一年,吕不韦带兵灭了东周。这是一个改天换地的大事,是秦帝国结束一个时代,开辟新纪元的开端。所以,吕不韦把灭周的第二年视之为秦国元年。这个时候,秦王嬴政还没有登位呢。两年以后,秦王即位,把吕不韦视为仲父,言听计从。由此看来,吕不韦实际掌握着秦国大权。秦国并没有多少文化传统。依靠着金戈铁马横扫天下之后,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吕不韦在稷下游学多年,对中原文化非常了解。为了延揽天下人才,在写了《吕氏春秋》之后,“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历史记载,班班可考,似乎不是一个玩笑,而是确有其事。吕不韦为什么会这样做?在当时,得士则昌,失士则亡。战国四大公子,延揽人才,一时间为士人向往。吕不韦就是想通过一部书编纂,将天下人才吸引到秦国,为秦帝国统一天下,积蓄智力。《吕氏春秋》是一部很奇怪的书,是先秦两汉以来唯一一部最完整保存下来的书。分为12纪,各纪又有若干篇,总共160篇,篇篇字数大致相当,各有侧重,把战国以来诸子百家的内容,分门别类地辑录下来。可以说,这是诸子百家的百科全书。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很多经典,尤其是诸子百家的材料,流传于后世的已经很少了,而要了解先秦诸子,《吕氏春秋》是一部重要的著作。这是文化史的价值,而由于撰写年代的差异,我们又窥测到吕不韦的政治雄心。六年,抑或是八年,表面只是一字之差,但通过这些表面的数字差异可以找寻到很多文学线索。再比如读《论语》,我们发现,有些弟子如颜回等在孔子面前毕恭毕敬,而子贡、子路就很随意。并不是孔子对他们有薄有厚。要知道,颜回

和孔子差30岁,子贡、子路和孔子年龄相差不多。年龄很重要,年代很重要,道理不言自明。

介绍了这么多,都是打前站,还没有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即文学史研究到底有着怎样的多种可能性。

二、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

这个话题是由《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这本书引起的。作者认为,现存的古诗十九首多是曹植所作。对此,我不能接受。因此,当作者邀我作序时,我明确提出了与作者相左的意见。这组诗,连萧统都不知道作者是谁,两千年以后的我们,怎么可能给每一首诗找到作者?关于《古诗十九首》的成书年代,至少有四种说法:一种认为是东汉时期的,其根据无外乎诗中用到了洛水等意象,抒发了一些生命的感慨;还有一种认为是西汉的作品,或是作于两汉之际,其根据是其中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也有人认为作于六朝,或者东晋时的作品;钟嵘《诗品》还记载当时的一种说法,即这组诗为曹、王所作。上面提到的这部著作,就是抓住钟嵘的话,与曹植的生平创作相比对,居然一一找到对应关系。

我们都知道,说有易,说无难。钱穆曾经认为《老子》这部书不可能成于先秦,顶多成于汉初。但上个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就出现了《老子》帛书;1998年,在湖北郭店竹简也有《老子》。由此来看,钱穆的观点就站不住了。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12条辨伪的方法。比如说,这本书从来没有被提过,突然从地下冒出来;加入了很多后人的看法;在目录上从来没见过等等。今天来看,这12条所谓铁门限,条条都可以提出相反的证据,因此,也是靠不住的。中国古书的流传很特别,往往经过了一代又

一代的传抄和改造。这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众多的文学史现象说明,根据现有的资料,对某些作品硬性作时代的界定,往往容易顾此失彼,很难周全。可见,研究历史,应该有一种通达的观点。首先要还原历史,进入历史,同时还要走出历史,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看待历史的发展。

走近历史,文献学是一条必由之路。走近历史,涉及到一个方法问题,也就是读书的方法。我推荐的是文献学的方法。

文献学不是学问,是一种读书的方法,是进入历史的一种重要途径。进入的历史不仅仅是古代,还有近代、当代。我认为这是进入历史的最重要的途径。长期以来,学科划分越来越细,把传统的学科分为文、史、哲三个大系;中文系又分为语言和文学;文学又分为古代、现代和当代;古代又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唐代又分成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研究初唐的又继续分四杰、沈宋;研究四杰,又具体分王、杨、卢、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就被肢解得七零八落。这怎么能研究得好呢? 20世纪70年代有一部电影叫《决裂》,讽刺知识分子专讲马尾巴的功能。研究学术很有可能研究马尾巴,甚至研究马尾巴一根毛。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总体的观念,真的对历史有所了解,就会发现马尾巴真的太重要了。做研究当然不能大而无当,也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就涉及到了学术方法。现在的问题是,没有整体观念,路越走越窄,一个完整的历史,一个活生生的人被抽象成了木乃伊。读者有时会反感一些文学作品,特别是研究著作,就是因为它们没有一点生气。

现在人文教育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探讨综合教

育问题。但是很多学校搞的只是拼盘教育,似乎什么都学一点,譬如有所著名的大学搞国学教育,用英文授课,讲中国文学,似乎这样就是学贯中西。这样的教育怎么培养所谓的大师呢?其实,要真正进入中国传统学术领域,自有一套中国的读书方法,我把它概括成文献学的方法。现代人往往看不起传统的文献学方法,结果也就常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如研究郭沫若,往往只看他的全集,这就闹笑话了。因为郭沫若对于自己的作品,不断地修改,一改再改,有时候已经面目全非。如果用他80岁以后的改稿来研究20岁时的思想,不是闹笑话了吗?现代文学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连续召开多次关于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会议。现代文学不过30余年(如果按照从1911年到1949年来算),而古代文学至少3000年。如果研究古代文学不懂得整理文献的基本方法,不是更要闹笑话吗?所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有一个基本的途径,就是文献学。我甚至说过一个极端的话,谁如果绕开文献学,学术界一定绕开他。

文献学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古典文献学,二是现代文献学。古典文献学的内容主要包括: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相关知识。

第一个是目录学。目录学有什么用?当你离开老师之后,目录学就是你的老师,永远的老师。目录学其实就是你的导游图,当你碰到那些知识的时候,它告诉你去哪里找。如果我给出一个题目,让你在一周之内编一个专题文献目录,受过目录学训练的人一周内就能把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知识编成一部清清楚楚的文献学目录,包括原始文献、研究资料、研究现状,研究热点,等等。这就是目录学给你的最快的一条途径。没有

目录学的知识，在图书馆里找资料就像大海捞针。而受过目录学训练的人可以把它原原本本清清楚楚地找出来。所以中国人讲学问的第一条就是目录学。那些僵硬的、毫无生气的一个个书名，背后其实有着很多的文化信息。我曾经对目录学如痴如醉，每一本孤零零的目录我都能看出很多东西，涉及到书名、索引、丛书、类书等各个方面。不管你搞什么科学，第一条，就是目录学。

第二个就是版本问题。版本学是需要大家到图书馆去泡的。可以推荐大家几本书，一本是《书林清话》，这是很有用的一本书。还有就是魏隐儒的《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和《中国古籍印刷史》。魏隐儒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学者。1993年，他突然因病去世，留下大量的读书笔记。最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已经整理出版，书名叫《书林掇英》，副标题是“魏隐儒古籍版本知见录”，很有参考价值。

第三个是校勘学。读古书不懂校勘学根本没法读；还有文字学，由于搞文学的人往往要接触到很多的古籍和出土资料。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根本行不通。长沙马王堆的帛书，我读的是张政烺的一个校本。后来我发现，还有好几种释读本，各不相同。如何判断，就需要文字学的知识。

第四个是音韵学。音韵学也是绕不开的学问。在杭州读书时，我的导师姜亮夫先生要编《经籍纂音》，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摘录《经典释文》中的反切资料。当时茫然无知，没有好好学。毕业后，我发现吴承仕先生也要编这样的书，取名《经籍旧音》。可惜全书在战乱中失传，只留下一篇序。看了序以后，我才知道，英雄所见略同。可惜的是，这类音韵学的纂辑，迄今没有成书。听说《古音汇纂》正在进行中，我充满期待。

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做的是永明体的问题。永明体的核心问题就是音韵的问题，当时我去北京大学找葛晓音老师，说我不想做音韵的问题。她说，如果不做这个，你的题目还有什么意义呢？于是，我就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把《玉台新咏》和《昭明文选》中的诗，每一个字都按照《广韵》向前推，按照古音把它们归类。这本书出版后有20万字，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也就是这篇文章不足一万字的内容。罗宗强先生在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就引用了我的结论。这是我感到特别高兴的一件事，这说明我进步了。

第五个是训诂学，也就是注释学。有一段时间主题学、类型学这些东西很时髦。从类书里，找柳树类、杨树类，然后论述，但是这有什么用呢？在杭州求学的时候，郭在贻先生能把训诂学讲得非常具有吸引力。他所举的例子，往往都是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名家、大家整理本中的错误。由于不通训诂学，常常出现常识性的错误。可见这训诂学多么有用。对于古人来说，训诂学只是属于小学，而今快要成为绝学了，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虽然深奥，但艺不压身，也不要以为离得很远。只要下过功夫，早晚这门知识会给你带来好处的。磨刀不误砍柴工，有时候退一步就是为了进两步。刚开始的时候，可以不要追求发文章，专心于老老实实打基础，将来你一定会后劲无穷的。

这些知识，不一定深究，但一定要了解。当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应当知道去哪里找书。比如，当你碰到文字学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当今谁是文字学最好的学者，哪部是最好的书，当前音韵学的话题是什么，为什么在研究这些话题。一定要随时关注。

除了上述所谓小学内容外，还有传统的史学，也是文献的重要内容。

无论搞什么学问，我都建议大家关注一下史学。这里指的不仅仅是二十四史，不仅仅是津津乐道的历史故事，而是了解历史的基本工具。一个是历代职官，一个是历史地理，还有一个就是年号名讳。中国的历史是官本位的社会，正如上面所说，从古到今没有一个专业作家，都在官场之中的，所以要了解历代职官。建议大家关注一下这本书——《中国官制大词典》，很实用。还有一本叫《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

历史地理，实际上特别有用。我在杭州大学读书时，陈桥驿老师给我们讲《水经注》，他如数家珍，把历史地理讲活了，让我着迷。中国如此之大，名山大川，地域风情，各不相同。每个地方的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和性情，而这些会体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因此希望大家能注意一下。

年号、名讳也是阅读古书必须关注的内容。中国古代从汉武帝才开始使用年号，以前的纪年往往是上推而得的。中国人的避讳有些不近情理。陆游的《老学庵笔记》里就记载了很多避讳的东西。比如桥和他父亲同字或同音，他就不能走这座桥。还有大家所熟知的李贺，因为父亲名字中有“晋”字，与进士考试的“进”同音，也不能参加考试，当时的文坛领袖韩愈为他写了《讳辩》也没有用。因为避讳，中国古书常常被迫改字，甚至改得面目全非。为皇帝避还好办，有时还得为家人避。如《淮南子》，淮南王刘安的父亲叫刘长，他在书中就不用“长”，而是全都改成了“修”。可他不避皇帝的讳。由此也可看出当时地方诸侯权力很大。有时还得避当朝的大臣。《世说新语》里记载，有个文士写了篇文章，想给某个名士去看看，

去之前得想想这名士家人的名讳，以防触家讳，为此还得改文章。这就是所谓的人乡问俗，入门问讳。读古书不懂避讳是很麻烦的。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六朝文絮》，是清朝的人编的。目录上有一个叫“萧緯”的作者。我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个作者，以为有了新发现，非常兴奋，就去问曹道衡老师。曹老师说应该是“萧纲”。当时大臣替皇帝写文章，抄写的时候，临文不讳，但拿出去就要避讳，因此“萧纲”字不敢写，就成了空格，后人传钞的时候就在空格里加了“諱”字，再传抄时又由此“諱”字变成“緯”。这种例子在中国古代真是比比皆是。

有上述知识作基础，再给自己制定一个读书计划，就可以打下较好的学问基础了。所谓长期的读书计划，我的导师姜亮夫先生给我们指定了12部经典，首先是5部经书：《诗》《书》《礼》《易》《春秋》，以及由此而来的是“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再加上《论语》《孟子》及《老子》《庄子》和《楚辞》。此外，我个人还主张熟读《昭明文选》。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就是由这些基本典籍逐渐发展开来的。文学所的年轻人每周二都在重读“十三经”，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要了解中国文化，就是要从这几部书读起。

我的老师姜亮夫先生常常跟我说，他非常怀念老师王国维先生，说王国维先生的学问如此之好。当时姜先生已经80多岁了，已经出版了30多部书。在上个世纪的30、40、50年代，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他的著作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到了社科院，曹道衡老师也常常对我说，他也非常怀念游国恩先生，游国恩先生的学问特别好，自不用说。而曹先生的学问，也非同寻常。他是无

锡国学师专的学生,学术根底在先秦,可他很少写有关先秦文史的文章,直到晚年才开始涉猎,因此我们不知道他先秦的根底有多深。他的《从〈大狗赋〉看〈伪古文尚书〉在北朝的流传》叫我略窥曹先生学问的一角。他读严可均的《全三国文》,读到《大狗赋》,其中用到《伪古文尚书》的典故。《伪古文尚书》相传最早是东晋时期在江南出现的。如果在三国时就有《伪古文尚书》,那就是一个重大的学术史问题了,就说明《伪古文尚书》不会是东晋才出现,很可能更早。由此深入,曹先生发现了原来的错误,作者并不是曹魏时期的,而是北魏时期的。由此又推到了《伪古文尚书》从东晋伪造出来以后什么时候流传到北方。这种文章,没有深厚的先秦功底是做不出来的,所以我对曹老师说,这种文章我做不出来。我们现在才知道您是“先秦的根底做六朝的文章”。

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人,往往有今不如昔之感。我长期以来就持这种观点,认为我们这一代人自幼没有机会读书,先天不足。没有想到的是,现在我也写了几本书,居然也有年轻的同道颇认可我,说我学问不错。其实,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们这代人颇多欠缺。当然,我们也有特点,其中最明显的特点有三个:一是确保了中国现代的学术链条没有中断,二是用功,三是用心。大学毕业30年,从1977年考入大学到现在,没有一天离开过书。同时我们也用心,用心就是我们学的关于文献学的这套东西,并没有人教我们,而是自己摸索着进了这个领域。

最近一些年,我出国访问,发现了一批学术新锐,他们有学术抱负,又有学术眼光。他们就像20世纪初期从旧阵营中杀出来的学者,将来一定会有出息。这也引起了我的思考,那就是学术

研究不是一代不如一代,而是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学问,不可超越,不可替代。我在《清华大学学报》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古典文献学的现代生成》,主要论述了文献学研究的现代优势,或者说现代特点。

第一是电子文献。记得好多年前的报纸上有一篇报道,说记者在余秋雨书房看到一部四库全书。这在当时被传为笑话。因为当时台湾影印的四库全书还没有在大陆销售。真正的四库全书当时仅仅钞录七部,战乱中毁了三部,残了一部。现在仅有完整的三部,分别藏在北京、兰州和台湾。作为个人,他怎么可能拥有一部四库全书呢?但是现在,拥有一部四库全书已经不在话下了。不仅如此,拥有二十四史,拥有十三经,拥有古代丰富的典籍,由于电子文献的出现,这些似乎都不是问题。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幸运的一点。我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出版方式,流传方式,阅读方式,乃至做学问的方式,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是出土文献。王国维先生在1924、1925年左右在清华做了一篇演讲,叫《近十年来中国学术之大发现》。集中到一点,他认为,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王国维主张新发现,黄侃主张新发明。学术研究的真谛是新发现,还是新发明,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王国维特别注重发现,可是黄侃不以为然。今天来看,新资料的发现,可以引领一个时代,当然还有新的观念。最近30年,已经到了地不藏宝的阶段。关于出土文献,不仅是考古学的意义,对文学研究也有重大推动意义。

第三是域外文献。所谓域外文献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域外的原始文献,一个是域外的研究成果。前者已经成为当前的热门话题,很多

地方已经开始关注和整理这批资料。最近,我刚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评审工作,其中就有一个对域外汉籍的系统整理项目。国家将不惜重金,把流失在海外的重要典籍全部引进回国。海外的敦煌文献基本都已经影印出版了。现在还有大量的宋元刊本,也将陆陆续续影印问世。这些东西非常重要。

关注域外的研究,我曾有过深刻的教训。20世纪90年代,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从补课做起》。我补的第一课,是古典文献学;我补的第二课,是国外文献学。1991年我分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碰到一个德国学者来找《文学遗产》过刊。他是搞汉魏六朝文史研究的。他说,外国人研究比你们好多了。但是我很不解甚至愤怒,我想,我的学问不好,还有曹道衡先生那一代,再往上,还有余冠英、俞平伯、钱钟书他们,哪一点比不上外国学者?当时我曾很是赌气。日本立命馆大学著名学者清水凯夫教授是日本“新文选学”的代表,曾写过一系列文章,认为四声八病都是沈约所作的。而我就查对资料,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模仿陈寅恪的《四声三问》,写了《八病四问》,还把文章寄给清水凯夫教授,小有得意。1996年到美国作学术访问,看到了德国出版的《敦煌吐鲁番出土梵文文献》,其中涉及到一些四声八病的材料,这批材料大约是公元五世纪前后进入中土,正好是沈约的年代。后来,我写了篇东西,叫《别求新声于异邦》,专门介绍西方关于四声八病问题的研究成果,也是对于过去的偏见进行反思。

三、结语

最后,我想起王国维先生的一句话。

有一次,他的学生姚名达向王国维询问做学问的方法,王国维就问他在读什么书,姚名达说自己在读《史记》,并陈述了研究打算。听了之后,王国维说了这样一段话:“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创获。”^①这其实就是王国维的道路。他年轻的时候,喜欢文学创作,他的《人间词话》,写得多么艳丽。后来他发现文学实在是“可爱而不可信”,转而研究哲学问题,研究叔本华,研究尼采,但是沉溺其中,又叫他觉得哲学“可信而不可爱”。又转而研究甲骨文,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两篇大文章,与《史记》一对照,一一吻合,一方面也证明了甲骨文是殷商文字,一方面证明是《史记》确有所本。几年后,他说卜辞研究已经差不多了,从资料上他确实做到了极致。后来做蒙古史研究,做汉晋竹简研究。凡是他所涉猎的学术领域,几乎都有重大发明与创获。

由此来看,学问不能太功利,因为学问本身就是目的,它能给你带来快乐和满足。我把王国维的话作为这次演讲的结束语。

(本文原载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任《文学评论》杂志主编、中华文学史料学会会长等职。)

①姚名达:《哀余断忆:之二》,《国学月报》1927年10月。

摩石有心,汲古无闷

——李浩教授《摩石录》读后

赵阳阳 / 西北大学文学院

陕西历来所出石刻极多,而以金石学见长之学者却不多。最为人熟知的,当是明末整屋的赵崡和华阴的郭宗昌。钱谦益《华山庙碑歌题华州郭胤伯所藏〈西岳华山庙碑〉》云:“关中汲古有二士,郭髯赵崡俱嵯峨。”^①钱氏在此诗中将赵崡与郭宗昌并称为“关中汲古二士”,不仅因为二人活动时代、地域接近,更着眼于二人的访碑活动与汲古精神。

李浩教授身为陕人,居汉唐旧都四十余年,汲汲於郭赵之好者亦有数年,最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推出其《摩石录》一书,便是其数年成果的结集。书中所探讨的石刻,据其内容可略分为两类:一是唐代士人墓志,一是唐代少数民族与入华外族人之塔铭、墓志,与陈寅恪所云“塞表殊族”有关,属于近代以来中西交通史研究的范畴。李浩教授认为,“墓志研究涉及到古人对冥界立体多元的规划和营造制作,其中既有观念层面,

也有技术层面和材料层面,还有艺文美术层面,与现代的医养学、死亡学、宗教学、规划学、建筑学、美术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材料科学等息息相关,关涉‘古今学术史之通义’的‘大事因缘’,是尚未被广泛重视的学术富矿。”^②缘于此,他甚至暂时冷落了此前的唐代园林文学、唐代家族与地域文学研究,遵从兴趣,寻幽探微,鞭辟入里,很快找到石刻文献学这一专门学科的矿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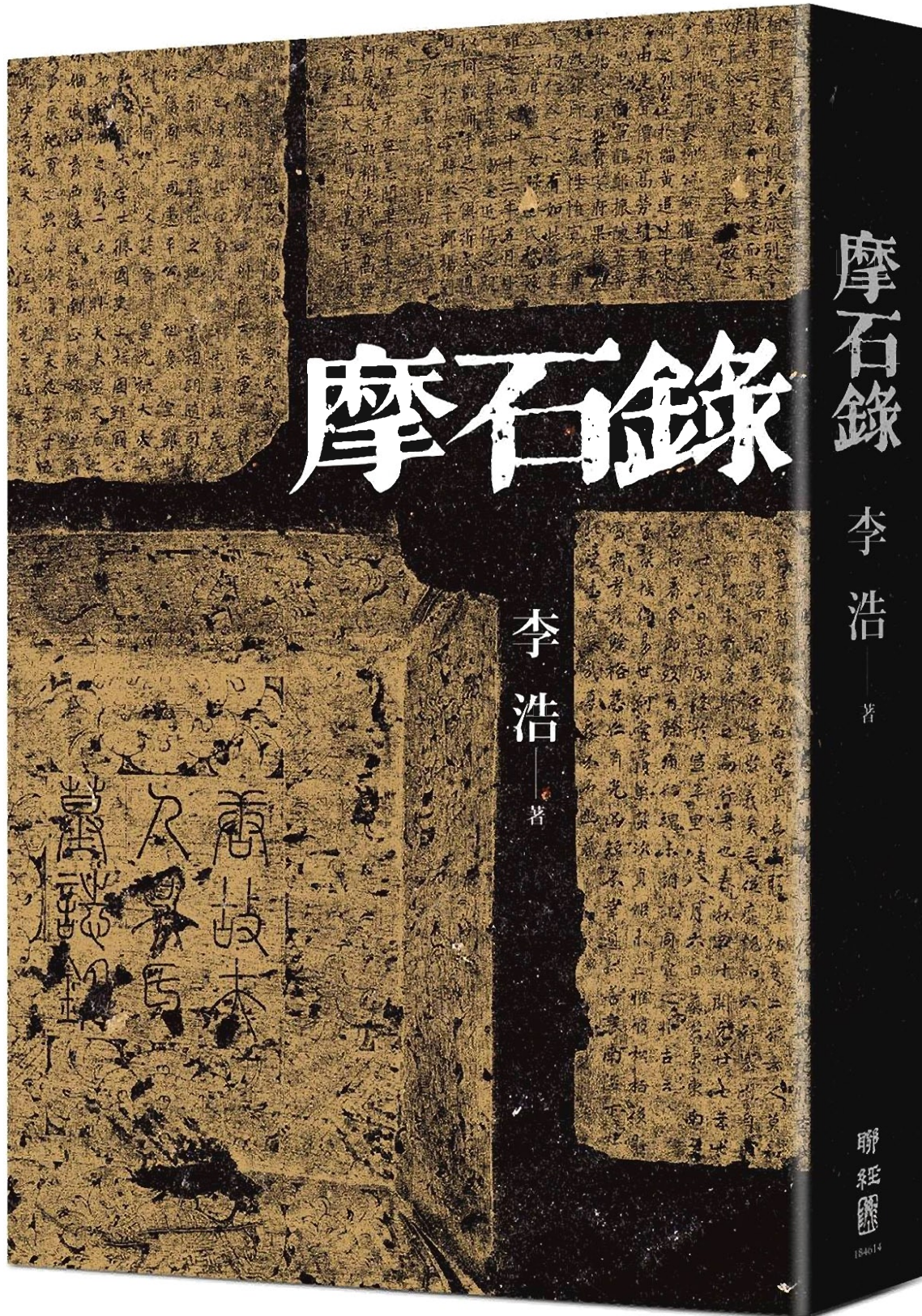
李浩教授称其步入石刻研究领域“纯属偶然”,且自谦“本不擅金石学,从没有在此领域开疆拓土的雄心壮志”^③。其实早在二三十年前,他所撰《范碑所述李白世系的谱牒学问题》(《中国李白研究》1997年)一文已经娴熟利用碑志文献,其《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及《唐代三大地域与文学研究》中也多有利用石刻文献之处。^④籍读全书一过,窃以为李浩教授之《摩石录》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贡献:

①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十三《试拈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56页。

②李浩著《摩石录》之“封面介绍”,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版。

③李浩《摩石录·代前言》,载《摩石录》,第19页。

④此外,李浩教授对台湾中研院毛汉光先生的研究颇为稔熟,对其观点多有引据,尤其是对陈寅恪先生唐宋文化变革说的修正,与毛氏持论相近。而毛氏曾耗费十年(1984—1994)编《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十八巨册,其《中国中古社会史论》(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中国中古政治史论》(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等著作中的许多认识即建立在广泛利用石刻文献的基础上。



摩石錄

李浩

著

李浩

著

聯經

184614

一曰汲古聚珍。此就其保存稀见文献之功而言,谓其于零金碎玉兼收并蓄。

《摩石录》中所涉墓志均为首次公开发布。李浩教授在序言中称此书系承担《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整理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其中涉及博物馆委托整理的一百六十余方墓志中的八方。这八方墓志分别是《祖孝孙墓志铭》《李百药墓志铭》《冯五娘墓志铭》《宗氏夫人墓志铭》《邵建和墓志铭》《安优婆姨塔铭》《吐谷浑公主墓志》《回纥会宁郡王移建勿墓志》^①。李浩教授能在众多墓志中迅速捕捉到这八方墓志的重要信息,其学术敏感性不言而喻。他不仅对这八方墓志进行著录、点校,还结合传世文献、其他石刻文献进行了深入讨论,从诸多方面凸显了这八方墓志的珍贵文献价值。《新发现唐初乐律学家祖孝孙墓志释读》一文利用墓志,厘清了不见于正史记载的祖孝孙的职官迁转、生卒年等信息,补订了祖孝孙家族的世系,结合传世史料,对祖孝孙的家学师承、乐律学贡献等做了深入研究。前人于唐代修定雅乐的起讫时间,一说“七年修定”,一说“九年定乐”,吉联抗先生据《资治通鉴》《唐纪七》《唐纪八》记载明其起讫,李浩教授发现前人皆未引及的《唐会要》卷三二《雅乐上》,明确记载了唐代修定雅乐的起讫时间,较《资治通鉴》所用材料更为原始。在考察祖孝孙家族世系时,发现《祖孝孙墓志铭》与《北齐书·祖珽传》所载祖珽与祖崇儒关系有不同说法,墓志云祖珽为祖孝孙之父,《北齐书》则说祖崇儒是祖珽的族弟。李浩教授以

为:“以命名序辈考证,祖珽字孝徵,其弟有孝隐,应该与孝孙是同辈,《北齐书》是唐初李百药主撰,应与祖氏家族有交往,何以有此问题?”^②并没有根据墓志率尔否定与祖氏家族有交往的李百药之记载,显示了实事求是的学风。《冯五娘墓志铭录文与释读》一文系对新出土由褚遂良撰并书的《冯五娘墓志铭》的校录与解读。冯五娘出身高贵,尤其是其子薛万均、薛万彻、薛万备,更是李唐开国的功臣。此文对冯、薛二家史实考察非常深入,且与史书、新出墓志等文献进行对读互证,“使得薛世雄家族的历史影像,可以有许多更细微的像素”^③。李百药是初唐重要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前此已出土李百药祖父母的墓志,今将《李百药墓志铭》与之对读,则不惟可以增强历史影像的像素,对初唐乃至整个中古时期士族转型、社会转型都有着重要的案例价值。《摩石录》中的《新发现唐李百药墓志铭及其价值》《唐代士族转型的新案例:以赵郡李氏汉中房支三方墓志铭为重点的阐释》两文便是以《李百药墓志铭》为中心,由小及大、由局部到整体的研究。文章重点讨论了隋唐之际李氏汉中房支丧葬地点的改变,并由此引发对“唐宋变革论”的质疑。文章认为以丧葬地的改变来表征家庭活动中心的变迁,在西魏北周或者更早就已经出现,毛汉光所谓的“中央化”(士族由桑梓故里向政治文化中心的迁徙)也可以随之前推。这一发现大有助于细化学界对中古社会转型的研究,体现了作者高屋建瓴的视野。《新见李白姻亲宗氏夫人墓志考略》就新见

①在《摩石录》中,《回纥会宁郡王移建勿墓志》是与另一方坊间所藏《回纥赠天水郡王李府君墓志》合并研究的。

②《摩石录》,第54页。

③《摩石录》,第109页。

《宗氏墓志铭》进行考察,宗氏为宗楚客次女,与李白有姻亲关系,文章通过对宗氏世系的考察,补正了新旧《唐书》的记载,对认识李白的家庭生活也有裨益。刻石是古代石刻生成的重要环节,刻工便是这一环节的主体。《新发现唐代刻石名家邵建和墓志整理研究》就新见《邵建和墓志》展开讨论,首先明确了邵建和的生卒年、卒葬地、家族世系,其次通过墓志中对唐代刻工名家的罗列,可以简单勾勒出唐代石刻刻工的谱系,为进一步撰写“唐代刻石史”提供借鉴。另外将邵建和置于中古家族发展史上来看,随着世胄阀阅类家族的逐渐衰微,寒庶技艺类家族的社会地位则进一步提升,邵建和家族便是这类寒庶家族的代表。《新见唐代安优婆姨塔铭汉文部分释读》系对榆阳区石刻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安优婆姨塔铭》汉文部分的释读。《安优婆姨塔铭》是用汉文与粟特文双语书写的塔铭,对于入华粟特人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李浩教授通过对汉文部分的解读,发现此安姓优婆姨与当时多数粟特人信仰祆教不同,而是信仰由信行禅师所创立的三阶教。她死后用林葬之法,进而起塔于信行禅师塔侧。三阶教信徒多有居士,且不乏女性信徒,此安姓优婆姨即是众多女性信徒之一,不过其粟特人的身份,特别值得注意,也是三阶教传播及于外族的一个重要例证。有两方墓志的研究,李浩教授谦称为“初步”的考察与整理研究,分别是《新见唐代吐谷浑公主墓志的初步整理研究》《西安新见两方回纥贵族墓志的初步考察》,这两方墓志

均涉及“塞表殊族”,此前隶属于“中西交通史”的研究范畴,论文主要就“回纥”的名称问题、入华回纥人的寿数、葬地、身份、居所,以及唐与回纥之间的婚姻问题等展开讨论,对进一步推进回纥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

二曰汲古观澜。此就其研究结论而言,云其可观历史之风云波澜也。近年来对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的反思文字不少,^①但多是从宏观层面理论,结合具体的案例来谈的较少。李浩教授《唐代士族转型的新案例:以赵郡历中房支三方墓志铭为重点的阐释》一文,将《李百药墓志铭》与其祖父母的墓志(《李敬族墓志铭》《赵氏(兰姿)墓志铭》)联系起来对读,将其置于中古时期士族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认为李氏汉中房支丧葬地点的改变,表征家庭活动中心的变迁,预示着隋唐之际士族的转型已经存在,甚至上溯西魏北周乃至更早时期,也偶有存在毛汉光所谓的“中央化”情形,只不过这种变化并非暴风骤雨式的大运动,而是和风细雨般的小变动,其间潜移默化,数量上有多与少、规模上有大与小、性质上也有显或隐的区别。李浩教授认为对士族转型或整个中古社会转型有重大影响的系列变迁在初唐时期已初见端倪,他从六个方面逐一展开,分别是: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从南向北的流动;从桑梓故乡到政经中心的转变;由经学史家向文史政事家族的转变;由文史家族向文学词臣家族的转变;由察举制向科举制的转变。并认为由察举制向科举制的转变,“与前列各点多有交叉重叠,出现于隋,制度

^①仅近年来的反思文章已有数篇,其中代表文章有杨际平《走出“唐宋变革论”的误区》(《文史哲》2019年第4期)、张邦炜《唐宋变革论的误解与正解——仅以言必称内藤及会通论等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5期)等。

化于初盛唐,对唐代乃至整个前现代的中国都发生重大影响,也是士族转型及中古社会转型的重要推手。”^①李浩教授的这一发现不仅有助于细化学界对中古社会转型的研究,而且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导。此文与陈寅恪先生以赵郡李氏西祖房即李德裕祖孙丧葬地及祖茔所在,分析山东高门大姓的变与不变,思路有相近之处,但陈寅恪先生所选择的案例恰在中唐时期,与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暗合,可以认为是对内藤学说的进一步阐发。李浩教授则将时代上溯至初唐时期,实则是对内藤学说的修正。因此,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此文可以看作是对陈寅恪先生的致敬。作者谦称自己的研究系抛砖引玉,实则书中所收数篇论文,所得到的结论,对于我们认识唐代的政治文化变迁启迪颇大。

三曰汲古得綆。此就其方法贡献而言,云其授人以渔,示后学以轨辙。同样在《唐代士族转型的新案例:以赵郡历时汉中房支三方墓志铭为重点的阐释》一文的摘要中,李浩教授有感而发:“新出隋唐文物文献甚多,如能做进一步梳理,并能结合传世文献,不仅能做史料比勘,而且能做细致的史学分析,其意义将会逐渐显示出来,新文献的价值也会逐渐为人们所认知。”^②而长期以来的石刻文献研究,做史料比勘的多,作史学分析的较少。^③这期间当然受到石刻史料碎片化因素的影响,但学界急于发表、力求速成的学风恐

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窃以为当下的石刻文献学研究,不仅应当重视以石刻史料为中心的研究,更应重视以石刻史料诱发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若将新见石刻史料作为解决某一问题的关键材料或材料之一环来看待,就必然要求学者广涉相关史料,将传世文献、旧出土文献(有些已经成为传世文献的一部分)与新出土文献融会贯通,如此方能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形成“既能广大又能高”的典范之作。在《摩石录》所收诸文中,多数文章不仅立足于史料研究,更立志于史学分析。除前揭对《李百药墓志铭》的研究外,《冯五娘墓志铭录文与释读》一文对新出土由褚遂良撰并书的《冯五娘墓志铭》的校录与解读也体现了这一特点。此文对冯、薛二家史实考察非常深入,且与《隋书·薛世雄传》《旧唐书·薛万彻传》、新出《薛万述墓志》《薛万备墓志》《薛玄育墓志》《薛贵珍墓志》等文献进行对读互证,丰富了对于河东汾阴薛氏家族相关史实的认识。《西安新见两方回纥贵族墓志的初步考察》亦结合其他已发布的三方回纥贵族墓志进行研究,虽然集中在几个较为具体的问题上,但着眼点却是回纥史研究的大背景。李浩教授在《摩石录代前言》中指出:“从广谱的交叉科学的角度来进行挖掘和研究,至少涉及以下五个领域及其相关学科:一是生命伦理学……二是遗址景观学……三是丧葬人类学……四是图绘现象学……五是碑刻文献学。”^④在对五

①《摩石录》,第124页。

②李浩《究人冥天之际》,载《野生涯——文事与文心的当下省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年,第123页。

③可参陆扬《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4辑。

④《摩石录》,第36—40页。

个领域,尤其是前四个领域做出较为详细的说明后,他进一步指出:“从这样宏阔广域的视野看墓志或石刻文献乃至传统的金石学,我们已经做的工作及其开拓,还是太少,有些似乎才刚刚起步。”^①诚如李浩教授所言,传统金石学乃至此后的石刻文献学,囿于“不语怪力乱神”的圣人遗训,更囿于对前人墓葬的敬畏,一般对墓葬及其附属物的观念研究与文物研究均较少涉及。李浩教授所云开拓金石学的视域,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当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也为后学指明了研究的新方向,可谓石刻研究的“朝前看”。李浩教授提及的诸条路径,能否成为学术的新的增长点,关键在于能否产生代表性著作——即前人所谓“范式”的出现,^②如有典范之作,则自有后学循其轨步,开拓更为广阔的学术世界。例如,巫鸿先生立足现代考古学、美术学对墓葬艺术进行了深入探讨,其着眼点安放在“美术”之上,从图像上溯、推测、构拟前人对于死亡的认识、对于冥界的臆想,形成了《武梁祠》《黄泉下的美术》等“范式”,极大地开拓了今人的研究视域,也引导了不少后学跟进美术考古这一领地。

相较于李浩教授对石刻研究“朝前看”的方

法论启示,窃以为石刻研究的“回头看”在当下也有重要的意义。学问之道,首重传承,所谓创新,应当是在做好传承工作之后的题中应有之义。莫砺锋教授曾说:“如今的学术考评体制,往往片面强调创新二字。学术研究当然要有创新精神,但是从文化史的大视野来看,也许我们更应该强调传承。”^③史睿在《唐代石刻研究杂谈》中说:“相对于现代石刻研究,旧式金石学虽然范式已经过时,但是历代金石学积累知识却不过时,当代研究石刻者,应当总结前人研究成果,有效地继承前代积累的相关知识,为今天的研究奠定基础,非此不足以言学术推进。”^④有鉴于此,有必要对传统“金石学”的发展与其基本任务略作回看。

宋代为金石学的发源期,草创之初罕见总结之言,但不乏具体的实践。有宋一代金石学著作如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多以史实考证为主旨,只在《集古录》等少数著作中偶有品评石刻书法的内容。清初学者万经特别指出了宋代金石家多忽视书法品评的阙失:“前代金石遗文,每足补史家之阙,昔人欧阳公、赵明诚、洪景伯、杨用修、都玄敬、赵子函、王元美辨之详矣,未有论及书法者。余颇嗜分隶,以少所涉历搜罗狭

①《摩石录》,第40页。

②余英时先生常引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中心观念——“典范”,来论证学术史上的经典产生及其对学术的推动意义。在余先生看来,“典范”可以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典范”指一门科学研究中的全套信仰、价值和技术,因此又可称为“科学的典范”。狭义的“典范”则指一门科学在常态情形下所共同遵奉的楷模。这个狭义的“典范”也是“科学的典范”中的一个组成部份,但却是最重要、最中心的部份。(参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载其《历史与思想》,2014年5月)程千帆先生在《闲堂书简》中屡及新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与文学研究的关系,也曾鼓励年轻学者利用新方法做出“典范”成果,而不仅仅是只重理论和方法,从理论到理论。

③莫砺锋2019年10月21日在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闭幕式上的发言,“程门问学”公众号整理后拟题《宋代文学研究的价值与担当》。

④《唐宋历史评论》第四辑,2008年。

陋,只就时时观览者稍为评鹭,示之同好,或有取焉。”^①万经为了凸显其著作特色,不免有曲解古人之嫌。如赵子函(赵峒)、王元美(王世贞)的著作多有评论书法的内容,决非“未有论及书法者”^②。然而万经在不经意间道出了宋、清金石学家对金石碑版的不同兴趣,这种兴趣的差异直接反映了宋、清两代金石学的发展走势。考据派在清代以前一直是金石学研究的主流,到了乾嘉时期,着眼鉴赏的翁方纲一派则始终处于劣势,以致翁氏曾不无愤激地说:“近日言碑帖者,不知艺之与道通也,嫌其涉于仅言鉴赏,似游客之所为,故于碑帖必先求其与史传之合否。又往往必申石刻以抑史传,其意未尝不善,而其实则欲避居论书之名,为大言以欺人而已矣。”^③他批评当时学者重史轻书的习气,指责他们以考史为幌子而不敢直言论书的欺人之举。要之,自宋代至清代中期,金石学的考据与鉴赏两派即各依其轨迹自行发展,虽互有消长而终以考证占绝对上风。^④

然而到了晚清时期,在不少金石学家看来,对石刻书法的研究应当是石学研究的正途,甚至居于首要地位。叶昌炽《语石》卷六云:“然吾人搜访著录,究以书为主,文为宾。文以考异订讹,抱残守阙为主,不必苛绳其字句。”^⑤简直可算是公然为鉴赏派张目了。吴昌绶评《梦碧簪石言》云:

“近代言金石者,颇不乏人,愚意总嫌骨董气太重,前贤动以证经补史,作大题目。其实搜残剔剩,所得几何?不若质言文章之美,书迹之工,与夫图画艺术之精异,较有真际。再进言之,直是吾侪之嗜好已耳。以嗜好之专,自成为一种学问。”^⑥可以看做是鉴赏派的馀脉。然而,金石学著作偏重书法评鉴却绝不是自翁方纲开始的,明末赵峒的《石墨镌华》与郭宗昌的《金石史》中多有对汉唐碑刻书法的品评,早已暗示了金石学研究风习的某种迁移。

鉴赏派巨擘翁方纲等人的见解颇为其后史学家鄙薄,然夷考其实,翁氏之说自有其道理。传统书学研究在石刻大量出现以前,主要依据真迹、刻帖等,然真迹难得一见,刻帖内容多为信札,字体多为行草,又往往为小字,远不及石刻书法内容与形式之丰富多样。故晚明以来表彰碑学,其实是拓宽了传统书法研究的苑囿,为重订书法史提供了坚实的材料基础。故书法史的研究如果脱离了金石,则几乎无法展开。但是石刻之于史学,多是不够系统之断片,不可能替代正史成为史学研究的主体。故而翁方纲、叶昌炽等人的见解,是将金石学分为以金石为中心的学问和以金石为材料的学问。就此而言,书法鉴赏理所应当是金石学的核心内容。这也是包世臣《艺舟双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杨守敬《学术述言》等名著撰作之缘起。尤

①万经《分隶偶存》卷上“汉魏碑考”条,民国《四明丛书》本。

②四库提要存目部分著录王世贞《弇州山人题跋》七卷,有墨迹跋三卷,墨刻跋四卷,系自《弇州山人四部稿》中抽出者,其内容多涉及书法。四库提要称《石墨镌华》“详于笔法而略于考证”(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影印浙本,1981年,第739页)。

③翁方纲撰《考订论》上之三,《复初斋文集》卷六,清李彦章校刻本。

④参拙著《明代书学文献研究》第五章《金石类文献考论》,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02—206页。

⑤叶昌炽、柯昌泗《语石 语石异同评》,陈公柔、张明善点校,中华书局,1994年版,2005年第二次印刷,第396页。

⑥顾燮光《梦碧簪石言》卷首《评语》,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民国排印本,2020年,第343页。

其是叶昌炽的《语石》，“精博详赡，体例完善，实是金石书中空前绝后之作”。^①作为金石学史上的集大成之作，其“以书为主”的观点尤其值得重视。

由以上讨论而生发出一个大问题，即金石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其研究诸分支各有哪些金针度人的“典范”之作？自晚清入民国以来，西学东渐，域外的考古学理念渗透到国内学界，金石学开启了它的现代化转型。四库提要虽已在史部目录类下列“金石之属”，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虽径列“金石”一目，但均不及张之洞《书目答问》于史部别出“金石”一门显得意义重大^②，且《书目答问》卷末所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专列“金石学家”四十六人，与经学家、史学家、理学家并峙，金石学的地位进一步凸显。但若论对金石学分支的全面系统把握，却不能不提及梁启超。梁启超《饮

冰室文集》第六集之《书籍跋》中有为叶鞠裳《语石》所撰跋文一则，对石学研究的派别有极具价值的概括：“前清乾嘉以降，金石之学特盛，其派别亦三四。王兰泉、孙渊如辈，广搜碑目，考存佚源流，此一派也；钱竹汀、阮芸台辈，专事考释，以补翼经史，此又一派也；翁覃溪、包慎伯辈，特详书势，此又一派也；近人有颀校存碑之字画石痕，别拓本之古近者，亦一派也；其不讲书势，专论碑版属文义例者，亦一派也。此书专博不及诸家，而颇萃诸家之成，独出己意，有近世科学之精神，可以名世矣。戊午（1918）正月二十七日购得，穷一日之力读竟也。”^③在梁启超心目中，黄宗羲等的“义例”派与包世臣等的“美术”派虽然在研究规格上与考据派尚有不小差距，但其学术地位却是平等的。梁启超的分类较之前人更为细密，也更为公正。^④以下就

①顾燮光《梦碧簪石言》卷五“叶鞠裳之金石学”条，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民国排印本，2020年，第585页。

②容庚《金石书录目序》：“以金石之书而分列经史子集四库，虽有所受，实为不伦也。乾嘉以来，斯学大兴，其书益富。张之洞《书目答问》依郑樵《通志》之例，于史部别出“金石”一门，分目录之属、图象之属、文字之属、义例之属。”（载民国印本容庚《金石书录目》卷首）容庚特别提出了《书目答问》在金石学独立过程中的作用，可谓火眼金睛。

③《饮冰室文集》第六集《书籍跋》，云南教育出版社整理本，第3703页。初稿著成于1920年10月的《清代学术概论》十六《金石学、校勘学与辑佚学》中亦论及清代金石学派别，除未及校碑之学外，复将翁方纲与包世臣分作两派，谓翁方纲、黄易一派，专讲鉴别，包世臣一派，专讲书势。实际上，翁与包，分也可，不分也可，总体上看，均瞩目于书法也。可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岳麓书社，2010年，第55页。

④钱大昕在其《郭允伯〈金石史〉序》中云：“自宋以来谈金石刻者有两家，或考稽史传，证事迹之异同；或研讨书法，辨源流之升降。尝鼎一臠，各厌所欲，挹水钻燧，取之无尽。”（钱大昕《潜研堂集》卷二五，嘉庆十一年刻本）钱氏将金石学分为“考稽史传”和“研讨书法”两家，尚无轩轻，较为中肯。清末缪荃孙在其《王仙舟同年〈金石文钞〉序》中以人物为例，概括清代金石学的两大派别，并指出其渊源所在：“国朝谈金石者有二派。一曰覃溪派，精购旧拓，讲求笔意，赏鉴家也。原出宋人《法帖考异》《兰亭考》等书；一曰兰泉派，搜采幽僻，援引宏富，考据家也。原出宋人《金石录》《隶释》等书。”缪氏显然承继了钱大昕的分类，不过因人为说而已。与钱大昕对两派并无褒贬的做法不同，缪荃孙在序中掩饰不住自己的偏爱：“二家皆见重于艺林，惟考据家专注意于小学、舆地、职官、氏族、事实之类，高者可以订经史之讹误，次者亦可广学者之闻见，繁称博引，曲畅旁通，不屑屑以议论见长，似较专主书法者有实用矣。”（缪荃孙《王仙舟同年〈金石文钞〉序》，载其《艺风堂文续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据清宣统二年刊本影印本，第9页）对石刻研究的诸多分支不能公允看待的，自四库馆臣迄今不乏其人，如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是重要的石刻学工具书，其《凡例》云：“本编所收书籍，以论石刻者为主，其专论金文者不录。以有关考证者为主，其专评书法者不录。”（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5页）就更显偏颇了。

梁启超所论，略举金石学研究诸分支的代表作，以说明传统金石学的基本任务及其历经近代学术转型之后的现状。

一、证经考史。此派又可细分为证经一派与考史一派。石经研究为经学研究之一大分支，罗振玉《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王国维《魏石经考》《魏石经碑图考》、马衡《汉石经集存》、张国淦《历代石经考》《汉石经碑图》、屈万里《汉石经周易残字辑证》等大家之作，久为学界熟知，当代学者虞万里的石经研究正是踵续这一传统。石史互证之作，亦多名家之作，欧赵以来的金石大家多以考史为其本职，代表作如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朱彝尊《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武亿《金石三跋》等，此类可称作题跋体。今人罗新和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考证精审，实承自顾、钱等前辈名作。另有辑录一体，既有个人研究心得，也校录石刻文字、汇辑前人题跋，其变体则或附以图版，利于读者检核。辑录体的体例最佳，代表作如王昶《金石萃编》、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疏证》，其后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王其祎与周晓薇《隋代墓志铭汇考》亦略仿其体例。以上略就著作体例粗分，若以石刻史料在研究中的地位而言，考史之作又可分为以石刻为中心的研究和以石刻为辅助资料的研究。^①仅以前者为例，似可略分为专考与散考两类。专考如劳格《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

赵钺与劳格《唐御史台精舍题名碑考》、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刘淑芬《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侯旭东《佛陀相佑：造像记所见北朝民众信仰》等。散考如岑仲勉《金石论丛》、叶国良《石学蠡探》《石学续探》、程章灿《石学论丛》《古刻新诠》、陈尚君《贞石论唐》、胡可先《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等。李浩教授《摩石录》自然也属于此类研究的典范。当然，就多数石刻史料的存在状态而言，相较史书显得不成系统，甚或稍显支离，这就很难形成大量专门以石刻为中心的成果。故“散考”类著作，实际上多是石刻研究论文的结集。从某种意义上讲，此类论文似可看作是清人石刻题跋的扩充版，继承了清代石刻题跋之学的风习。^②

二、赏鉴之学。赏鉴派并不起于翁方纲，但至翁氏始发扬光大。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沈津辑本）、阮元《北碑南帖论》、包世臣《艺舟双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杨守敬《学书述言》、欧阳辅《集古求真》是赏鉴派的代表作。今人启功的《论书绝句》、华人德的碑学研究、陈振濂碑刻书法赏鉴等可看作此派的余音。这一派在当代似有衰微之势，真正鞭辟入里的评鉴之作很罕见。

三、目录之学。将王昶置于目录之学一派，似乎是从广义的“目录”着眼。实则王昶《金石萃编》

^①以石刻为辅助材料的研究，如徐松《登科记考》、严耕望《两汉太守刺史表》、郁贤皓《唐刺史考》《唐九卿考》等，暂不论及。

^②当代学术重论文轻著述的背景之下，以石刻为中心的优秀论文不在少数，如张学锋《南京司家山出土谢氏墓志研究——东晋流寓政府的挽歌》、陆扬《从碑志资料看九世纪唐代政治中的宦官领袖——以梁守谦和刘弘规为例》、仇鹿鸣《从〈罗让碑〉看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等，本文限于论述重心，不多涉及。

有“集大成”的性质,不仅蒐罗碑目,而且校录文字,广徵题跋,间附考证。孙星衍与邢澍《寰宇访碑录》、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等是石刻目录学的代表作。当代学人从事及此者亦不乏其人,如日人气贺泽保规《唐代墓志所在综合目录》、陈尚君《唐五代文作者索引》、冯秉文《全唐文篇目分类索引》等。目前孟彦弘先生即将完成的“唐代碑志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当是学界喜闻乐见的成果。

四、义例之学。此派专论碑版属文义例,以元潘昂霄《金石例》、明王行《墓铭举例》、清初黄宗羲《金石要例》为代表,卢见曾曾辑刻为《金石三例》丛书,流行甚广。清代是金石义例之学的成熟期,黄宗羲之后不仅出现了如梁玉绳等大家的义例著作和章学诚等的义例单篇,而且出现了卢见曾、朱记荣等刻书家,将这些义例之作汇辑成编,形成颇具规模的金石义例丛书。^①叶昌炽《语石》、柯昌泗《语石异同评》中也多有涉及碑版属文义例的条目。今人罕见此类纯粹的义例之作,但不乏讨论碑版义例的论文。如叶国良对石本与集本异文问题的考察、程章灿对墓志起源的考察等,颇能新人耳目。

五、校碑之学。校碑之学亦起于翁方纲,但翁氏之校碑文字多附于碑拓之末,散见各处,未成气候。至清末,方若撰成《校碑随笔》,校碑之学遂得以成立。此后罗振玉《雪堂所藏金石文字簿录》继其轨步,今人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仲威《碑

帖鉴定》等复踵事增华。民国十年(1921)吴隐跋《校碑随笔》称:“自乾嘉以还,金石家有二派,一曰鉴赏家,一曰收藏家。……药雨先生(案指方若)《校碑随笔》之作,於二派之外别开生面,自成一派。考阙字之多少,定拓本之新旧,虽半字及字之一角一画,或存或泐,或明晰或漫漶,皆在所必详,是金石学之校勘家也。……校勘者,鉴赏、考据之先河也,於经籍然,於金石何独不然?吾知药雨是书有裨於金石之学者切挚而精实,虽覃溪、兰泉复起,亦曰吾无间然已。”^②史睿也意识到碑帖拓本之先后对于石刻研究的重要性:“石刻文物因为时代久远,文字日渐磨灭,故首先需要详细调查早期拓本,以求将文字释录工作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古人研究石刻,首重善拓,今人限于学科分野,往往不能兼顾旧拓版本之学与史事考订之学。”^③可见校碑之学在石刻研究中的基础作用。民元前后罗振玉据善拓校订昭陵碑,所撰成之《昭陵碑录》在同类著作中最为精善,这与罗氏重视校碑之学密不可分。

六、综合研究。梁启超称《语石》“萃诸家之成”“有近世科学之精神”,颇类金石学教科书,姑称之为“综合研究”。顾燮光称《语石》“空前绝后”,但仍然撰作《梦碧簃石言》以承继《语石》。民国间柯昌泗《语石异同评》水准颇高,可与《语石》并传。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所收《中国金

①朱记荣辑《续刻金石三例》三种:梁玉绳《志铭广例》二卷、郭麐《金石例补》二卷、刘宝楠《汉石例》六卷;又辑《金石三例再续编》四种:李富孙《汉魏六朝墓铭纂例》四卷、冯登府《金石综例》四卷和《石经阁金石跋文》一卷、梁廷相《金石称例》四卷续一卷、王昶孙《碑版文广例》十卷。另清鲍振方亦撰《金石订例》四卷,有光绪10年(1884)常熟鲍廷爵后知不足斋刻本,亦有一定价值。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曾将以上著作与《金石三例》丛书合为一编影印出版,称为《金石全例》,颇便学者。

②吴隐《校碑随笔跋》,载民国十年(1921)西泠印社聚珍版《校碑随笔》卷末。

③《唐宋历史评论》第四辑,2008年。

石学概要》以及黄永年《碑刻学讲义》差近之，惟篇幅略少。启功先生曾建议对《语石》一书进行升级改造，配以图版，增补校订^①，此一工作如有学者悉心完成，当是金石学爱好者的福音。

此外，尚可以列出辑补之学，辑录以洪适《隶释》、都穆《金薤琳琅》、王昶《金石萃编》、吴玉搢《金石存》、罗振玉《昭陵碑录》、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等为代表，补订则以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陆心源《唐文补遗》、今人吴刚等《全唐文补遗》、陈尚君《全唐文补编》等为代表。这一工作中有辑佚学、编纂学、校勘学等学科的影子，从事者多有为他人做嫁衣的优良品质。

就以上所列几大分支而言，今人尚无远迈前贤的情形。有些分支甚至并无太大进步，以致并没有产生足以匹敌前贤的“典范”之作。因此，沿着古人的途辙继续前行，臻於极致，最终与古人并峙或超越前人，或许是一条仍旧可行之路。

最后，就李浩教授书中提及的石刻与史书关系问题以及石刻伦理问题稍作缀补。如何看待石刻和史书关系，前人也有比较融通的看法。邓之诚先生在《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说：“又今人治史，多重金石。金石足贵，此亦诚然。特其所以足贵者，亦只官阶、地理、姓名、世系、年月，或足以补证史阙而已。至于行实，则蔡邕作碑，唯郭林宗不愧，韩愈不免谏墓，南朝禁止立碑，亦正厌其虚美。人情所向，子孙万无丑其尊亲之理，况史家搜

罗旧事，谱牒志状，未尝屏弃不观。今之所贵，未必非昔之所贱，故以金石为旁证可也，闰位代嫡，谓金石以外无史，窃以为稍过矣。”^②其后岑仲勉先生在《金石论丛》中，黄永年先生在《古文献学讲义》中都表达了类似的想法。窃以为前辈的药石之言至今尚未过时，因此在篇末引及之，以与治石学者共勉。至於石刻伦理问题，最近读吴昌绶评《梦碧簪石言》，发现早有先见之明：“比来摸金发丘，愈无底止，尝叹其能扬古於国外，不能韞古於地中。大河以北，六朝都会之区，佛无所倚，魂无所栖。骨董家造孽至此，嗜好家亦有以导之，诚得大雅闲达於搜考之中，寓保存之意，厥功不甚伟哉！”^③抄录于此，以为考古者鉴。

“无闷”一词出于《易经》，可借以形容学术研究给学者而带来的一种恬淡、坦然的心境。李浩教授在《摩石录·代前言》中谈及他撰作此书的目标：“借整理《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穿越漫长幽深的时间和空间，触摸有温度的历史细节，考察重要事件的发生现场，聚焦古人对死亡的情礼百态，调整因史料缺乏而板滞的宏大叙事，细化并深化有更多高清像素的历史图景。”^④通读全书，我认为作者不仅圆满完成此一目标，而且能够在汲古中获得一种冲淡甚至喜悦。我们也希望《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能尽快问世，为学界提供更多聚焦历史的高清素材，也为将来“唐文总汇”的编纂筑好基础。

①启功《金石书画漫谈》：“《语石》这种书，现在的人不是不能做，因为现在所出土的汉魏六朝隋唐的碑和墓志极多，比当年叶昌炽所能看到的要多出若干倍，要是加以统编，细细研究，附上插图，那就太好了。”载其《浮光掠影看平生》，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第160页。

②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4页。

③顾燮光《梦碧簪石言》卷首《评语》，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民国排印本，2020年，第343页。

④《摩石录》，第23—24页。

“碎片”的还原与透视

——评李浩教授《摩石录》

王雨晴 田子爽*

摘要:《摩石录》是李浩教授近年来关于唐代墓志研究的论文结集。该书的主要研究对象为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所藏的部分唐代墓志,均具备较高的史料价值,是中古史研究的宝贵新资料。书中研究集文字释读、史事考证与综合性分析于一体,视野开阔,发现众多,体现了对传世与出土文献的灵活利用与精确把握,凸显了严谨有序与刻意创新的研究风格,不失为墓志个案研究的出色示例。不论从史料价值还是研究成就上来说,《摩石录》都是值得关注的新成果。

关键词:《摩石录》 唐代墓志 还原与透视

《摩石录》是李浩先生近年所撰有关唐代墓志研究论文的结集,亦为《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整理工作的阶段性部分成果。全书计收九篇论文,均已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其主要研究对象,是近年新刊布的来自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的九方唐代墓志。作为墓志个案研究成果,该书集文字释读、史事考证与综合探讨于一体,将单方墓志中的细碎或片段的记载,准确还原到完整的历史现场当中,视野开阔,考证精审,发现颇多,彰显了作者较高的学术眼光、深厚的知识积累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关于九方墓志的史料价值,书中代序已有详细交代,此处恕不重复。简言之,九位志主的身份对中古史研究来说,具有较强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具体包括:乐律学家祖孝孙、名将薛

世雄之妻冯五娘、文学家兼史学家李百药、李白姻亲宗氏夫人、石刻名家邵建和、吐谷浑慕容成月公主、入华粟特人安优婆夷,以及旅居长安的回纥贵族(会宁郡王移建勿和天水郡王李秉义)。上述墓志当能对唐代乃至中古的历史、政治、社会、文化、宗教和艺术等多个学科的研究产生积极意义。

下面本文将从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和研究风格三个角度,对该书的学术特色展开评述。

一、广博开阔的研究视野:线性超越与多维考察

《摩石录》作为墓志研究专著,并未停留在“金石证史”的层次上,而是放眼更宽阔的领域,将墓志的琐屑叙述置于学术史和中古史发展的大脉络中解读,力图以小见大、以点带面,所涉学

* 王雨晴,女,南开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田子爽,女,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文学院访问学者。

科甚广,眼界亦高,是吸收前人成果又加开拓的创新之作,带有综合性研究的色彩。概言之,即做到了研究视野的广博开阔,这具体通过两个向度的努力得以实现:一是纵向的学术史梳理,二是横向的跨学科伸展。

第一,溯源穷流,坚持对学术史的回顾梳理。

重视对学术史的回顾,是李浩先生一贯的研究特点。正如王水照先生评《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使自己的研究汇入本课题的学术史序列之中,其创新点既来源有自,又坚确可信。”^①《摩石录》延续了这一特色,在研究某一问题之前,习惯扼要地梳理前人成果。这样一方面有助于读者很快地掌握问题的研究现状,获取相关资料、信息,为后来者有效合理地利用墓志提供重要参考;另一方面,也为在原有基础上的突破与深化奠定了可能。

《唐代士族转型的新案例——以赵郡李氏汉中房支三方墓志铭为重点的阐释》是一个典型例子。^②文章将李百药未随祖父母归葬原籍而葬于京兆府万年县一事,置于中古士族乃至社会转型的视角下考察。作者首先明确,陈寅恪早在《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③和《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④二文中提出一重要观点:直到中唐,山东旧族仍坚守旧习,把葬地置于祖茔之

所在,这表现了旧族能守护慎终追远的本意。接着,又引述毛汉光的士族新贯迁移到两京之“双家型态”与中央化趋向理论,即,中古士族的丧葬地和家族活动中心从桑梓故里向政治文化中心转变。^⑤基于二说,作者指出,陈寅恪和毛汉光虽然都引赵郡李氏为例证,但李百药家族属汉中房,陈氏所引的李吉甫父子属西祖房,毛氏所罗列的众多房支也不包括汉中房,且陈氏所选个案时代为中唐,而李百药则处于隋末唐初,这表明至少初唐时期士族便出现了中央化的迁葬行为。从而补正了陈氏结论,并为毛氏理论提供新的支持。再如,回纥墓志一文,先引述学者胡鸿的研究:通过罗列长安周边的突厥系人物墓志二十方,发现葬于南郊的只有一方墓志,据此推测南郊不是突厥人物的集中埋葬地。^⑥对此,作者指出,《移建勿墓志》和《李秉义墓志》都清晰地记载了其葬地在长安城南郊的京兆万年县凤栖原,这虽然尚改变不了南郊少的事实,但可知南郊不是突厥系(回纥)人物的集中埋葬地的结论并非完全准确,还有待新出土文献的补充(页286)。又如,成月公主志一文根据《法澄塔铭》的家世记载,纠正了前人认为法澄采石室瘞葬法是因其父萧瑀为三阶教徒的误判^⑦。又如,祖孝孙墓志一文因关于祖孝孙的乐律学成就学界

①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序第5页。

②李浩:《摩石录》,(台北):联经出版社,2020年,第123-149页。下文引用原书观点,均只注出页码,不再注详细文献信息。

③陈寅恪:《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56年第4期。

④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8-51页。

⑤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34-333页。

⑥胡鸿:《回鹘葛啜王子葬地张杜原考》,《唐研究》第19卷,2014年,第494页。

⑦刘淑芬:《石室瘞窟——中古佛教露尸葬研究之二》,《大陆杂志》1999年第2期。

讨论已多^①,故仅就《祖孝孙墓志》与传统文献的异同处稍作论列(页 80-83)。此类新见的得出,均是建立在对学术史的熟悉与自觉的创新意识之上的。《摩石录》参据已有成果,着重在现存的疑点、难点和争议点上用力,适时针对前说提出自身见解,对学界流行的观点做出回应,力图焕发新意,促成了新问题的发现与对旧问题的重新审视。

第二,博览精研,在多学科维度中发掘墓志价值。

墓志包蕴内容丰富异常,所涉学科广泛。近年来,关于使墓志研究从单一的史料考证走向综合性分析,学界呼吁日频。^②因而,如何全面挖掘和充分利用墓志的历史信息,以新材料引出新问题,避免同质性成果的堆积,真正推动学术研究的突破与深化,成为研究者面临的重要挑战。当然,这无疑对学者的学术视野和知识积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摩石录》以其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特质,为我们提供了良好参照。作为唐代文学领域的学者,李浩先生不囿于一隅,密切关注不同学科研究现状,将墓志中碎片化的史料有机地附着到中古史研究的各个命题之下,探寻新的学术生长点。书内触及问题,关涉文学、语言文字、宗教、音乐、石刻艺术、民族史、中外交通史、士族研究及丧葬习俗等多个领域。虽然有时仅作了问题的

提出和初步尝试性探讨,但足以推进我们对相关议题的认知,并提示诸多研究思路与切入点。

例如,书中发现,《安优婆姨塔铭》中“优婆夷”一词书写形式是“婆姨”,而非常见的“婆夷”,可为研究汉语词汇书写演变的进程增加新例证(页 240-241)。又如,安优婆姨未按世俗葬法祔葬其夫,而以林葬起塔形式陪葬三阶教创始人塔侧,与学界现有的孀居抚子女性信众才会林葬起塔的认识相悖^③。并且,来华粟特人集体信奉祆教,亦有信奉摩尼教者,安优婆姨却信奉三阶教,以及安优婆姨的卒时与建塔时间相隔三年之久,这些都将催生我们对唐代三阶教粟特信众与葬俗葬制的新认识(页 252-265)。再如,《安优婆姨塔铭》对其居于群贤坊私第的记载,可为粟特人在长安聚居地研究提供例证(页 248-251);回纥贵族墓志中的一系列记录,对了解旅居长安回纥人的葬地、丧葬资费、居所、与朝廷联姻及质子身份等问题极有帮助(页 278-279);《邵建和墓志》对唐代石刻名家的简要罗列,为研究唐代刻工提供了重要资料(页 188-194);《祖孝孙墓志》所述其乐律学成就,对考察唐朝音乐文化活动颇有意义(页 74-83);薛氏家族墓志对家族历史的叙述,对了解唐初政治斗争有所裨益(页 110-111)。此外,成月公主生平之于唐与吐谷浑关系研究(页 210-214),成月公主和孙法澄入寺

^①可参看王书钦《新出隋唐乐律学家〈祖孝孙墓志〉研究》,《唐史论丛》,2020年第2期;孙晓辉《祖孝孙的师承与家学研究》,《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②参见毛远明《碑刻文献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8辑),2009年,第29-38页;朱智武《东晋南朝墓志研究综述与理论思考》,《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6期;仇鹿鸣《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唐研究》第19卷,2014年,第554-560页;仇鹿鸣《言词内外:碑的社会史研究试笔》,载刘晓、雷闻主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9-44页。

^③参见刘淑芬《中古的佛教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79-285页。

修持之于唐代贵族女性修佛研究(页 214-218),成月公主所修习的兴圣寺之于长安寺庙研究(页 219-224),冯五娘抚育遗孤之于唐代母教文化研究(页 109-110),以及安优婆姨起塔地终南山大善知识林之于三阶教在长安丧葬景观研究(页 255-264)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值得提及的是,士族研究是墓志研究的重要课题。近年来,依托大量新出土墓志的士族个案研究亦渐成大观。^①李浩先生致力于唐代士族与文学之相关研究有年,著有《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与《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二书,故士族话题即成为《摩石录》关注的一个焦点。作者没有满足于对世系、婚宦平面化的连缀和描述,而是立足“转型”视角^②,特别注意志中涉及家族迁徙流动、知识风气等能够反映中古士族变迁的讯息,逐一予以揭示^③。例如,书中指出,《邵建和墓志》中邵氏刻工家族化、集团化之现象^④,可作为唐代寒庶技艺类家族社会地位得到长足发展的

有力证据(页 181-196);《李百药墓志》所记迁葬一事,则是士族流动迁徙和中古社会转型的缩影事件,据此能够将传统“唐宋变革论”中转型变化的时间上限前推(页 140);薛世雄家族墓志呈现其家学由尚武向崇文的转变,可视作士族文化传统变化的现象之一(页 110);《祖孝孙墓志》及祖氏成员史传资料,显示祖氏作为经学世家,亦擅算术、乐律、天文、历法等技能,进而反映了南北朝以来天下动荡,士族为家族延续修习多种艺术,以求有益于时务,迎合执政者需求的历史现象(页 63-74)。以上解读,均为从中古士族转型的视角考察墓志做出了有益努力。

二、规范多样的研究方法:灵活利用与准确把握

广泛全面地占有材料,对传世与出土文献的熟练掌握与充分利用,是将墓志研究引向深入的必要途径。《摩石录》在灵活利用、准确把握各类史料的基础上,解决旧问题,发现新问题,展现了规

①关于这方面的总结和反思,可参读仇鹿鸣《士族研究中的问题与主义——以〈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4期;仇鹿鸣《失焦:历史分期论争与中文世界的士族研究》,《文史哲》,2018年第6期。

②关于“转型”理论,作者在《唐代士族转型的新案例——以赵郡李氏汉中房支三方墓志铭为重点的阐释》的脚注19(《摩石录》,第143页)中引用诸多中外研究成果以说明。包括 David H. Harrison, *The Sociology of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Unwin Hyman, 1988; Robert M.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2, 1982; 包弼德撰,刘宁译《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1卷,第3期,商务印书馆,2000年;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增订本),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年。

③作者在文中这样总结对士族转型或整个中古社会转型有重大影响的一系列变迁:“一是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变……二是从南向北的迁徙流动……隋末唐初以来,士人为了仕进,又由南返北,并将丧葬地及家族活动的中心迁到了长安、洛阳一带。三是从桑梓故里向政治文化中心的转变,即毛汉光所谓“中央化”趋势。四是由经学世家向文史政事家族的转变。五是由文史家族向文学词臣家族(即陈寅恪所谓“进士词科阶层”)的转变……六是由察举制向科举制的转变……”(《摩石录》,第148页)

④研究唐代石刻刻工者多已注意到唐代石刻刻工的家族化、集团化现象,如曾毅公辑《石刻考工录·自序》,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页。

范多样的墓志研究方法。具体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将墓志资料与传世文献有机结合。

将出土墓志与传世文献结合,是墓志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摩石录》利用二者互补互证,既勾勒出人物世系和家族历史,又解决了其他诸多问题。如,利用《祖孝孙墓志》《冯五娘墓志》《宗氏夫人墓志》及《邵建和墓志》中对世系的记录,补传世文献之阙。再如,《薛万述墓志》和《薛万备墓志》均记其丁母忧及守孝的事迹:“太夫人玄衣月制。君去纓晨省,及风枝屡切,毁骨三年”,“寻丁太夫人忧,水浆不入于口,有过礼制。并剪发以为母毛也。及葬,庐于墓侧,负土成坟。孺慕婴号,柴毁骨立。皇帝屡遣中使存问,并令旌表门闾”。作者将此与《旧唐书·薛万彻传》中“万彻寻丁母忧解职”及《新唐书·薛万均传》薛万备附传中“万备有至行,居母丧,庐墓前,太宗诏表异其门”的叙述相参合,印证并细化了薛家的孝行(页109)。又如,关于李百药的生卒年问题传世文献有两种记载,两《唐书》记其八十四岁而卒,《谭宾录》及《唐诗纪事》记其八十五岁而卒,后人多斥后者不知所据,未予采录。今按墓志:“贞观廿二年二月廿六日寝疾,薨于京师胜业里第,春秋八十五。……以其年十一月十九日迁厝于雍州万年县少陵原,礼也”,卒时卒地及葬时葬地都具体明确,由是解决了李百药的年龄争议问题(页119-120)。如此,充分实现了新见墓志补史证史之价值。

第二,将多方墓志资料串联、比较。

单篇墓志中的史料往往显得单薄、零散,难

以呈现历史的全貌,有时甚至不足以反映历史的某个侧面,这也造成墓志个案研究容易趋于量的累积,而难以有质的突破。^①《摩石录》却善于联合多方相关墓志,采用串联或对比的方式,充分挖掘其中的历史信息,进而发现或解决许多依靠单方墓志难以触及的问题,为墓志个案研究提供了良好范例。比如,目前史传及学者的研究仅提及慕容诺曷钵有三子,而《弘化公主墓志》记有“嗣第五子右鹰扬卫大将军”,《成月公主墓志》谓其为诺曷钵第二女,联合二志可判定诺曷钵至少有五男二女(页208)。另如,将祖孝孙、李百药家族成员墓志串联,考察其家学传统与文化背景(页63-74,页134-136);将《安优婆夷塔铭》与《比丘尼坚行塔铭》《优婆夷张常求塔铭》对读,确证《安优婆姨塔铭》中“普别两种佛法”、“一乘”等概念作为三阶教义旨,标示了其三阶教信仰(页252-254);将《成月公主墓志》与《法澄塔铭》参合,知成月所修习的兴圣寺与李唐皇室关系密切,乃是有政治背景的大寺,为研究长安寺庙与政治之关系提供了有用素材(页219-224);将五方回纥墓志综合,据其对回纥称法的不同,推断回纥改名回鹘的时间发生于贞元四年(788)或五年(789)^②,并借此集中观察了旅居长安回纥人的葬地、丧葬资费、居所和婚姻等问题(页284-285)。诸如上例,将个案考察引向了深入与立体。

第三,对文献的性质与关系准确把握。

墓志文体具有隐讳虚饰的特点,记载的未必完全符合事实。面对墓志资料和传世文献,《摩石

^①见朱智武《东晋南朝墓志研究综述与理论思考》,《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6期。

^②关于回纥改名回鹘的时间,史书记载多有不同,学者讨论亦不少,可参看宋肃瀛《回纥改名“回鹘”的史籍与事实考》,《民族研究》,1995年第6期。

录》能够准确把握材料的性质,辨别主次真伪,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如,《李百药墓志》称其“情忘宠辱,心混是非”,作者认为这不过是盖棺后冠冕堂皇的表扬话,转而通过李百药的《封建论》《赞道赋》和《请放宫人封事》等政论和奏议,判断李百药非如墓志所言般“淡泊出世”,而是在政治生活中具备鲜明的是非判断标准(页144-145)。另外,墓志某些修饰性的表达,能真实反映撰者或志主家族成员的心态,此点亦为作者注意并发明。比如,《宗氏夫人墓志》《旧唐书》和李白诗歌对宗楚客坐罪伏诛事件都有评价,但褒贬色彩差异明显。《宗氏夫人墓志》曰:“少康祀夏之典,中令缉熙……家荣族偃,易世何常?覆巢焚次,贞姬未亡。”李白在写给宗楚客孙宗璟的《穷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中赞其:“皇恩雪愤懑,松柏含荣滋。”二者均是正面评价。而《旧唐书·宗楚客传》史臣评论则曰:“楚客、晋卿、处讷等谗谄并进,威虐贯盈,不使逃刑,可谓政正。为唐重臣,食唐重禄。颠危不持,富贵何足。二宗、一纪,谗邪酷毒,与前数公,死不知辱。”作者佐以王琦注,指出墓志和李白诗都不能算是一种史笔,而只是应酬文字的一种客套,故有惋叹赞誉之语,并强调,据目前已有史料未见官方公开的平反昭雪,只是对宗氏后人的待遇随时过境迁愈加和缓,而史臣最后的定性评价仍然是负面的(页163-166)。凡此,均能体现作者在材料鉴别与运用上的审慎态度和独到眼光。

同时,《摩石录》还注重梳理发明文献之间的源流关系。例如,《冯五娘墓志》对其夫薛世雄的死因一字未提,而《隋书·薛世雄传》中详细记载

了薛世雄讨伐窦建德大败而归、不久病卒的经过。作者认为,这种详略差别的原因是,墓志撰写之时,《隋书》的帝纪、列传已经完成,薛氏家族成员及墓志撰写者褚遂良知晓此事,故与正史互见,略其所详,详其所略(页98)。这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墓志与史传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墓志文本的形成机制提供了启示。

三、自成家数的研究风格:严谨有序与刻意创新

《摩石录》体现了作者鲜明的学术个性和自成家数的研究风格。要言之,共有四个方面:纲举目张的体例编排、敏锐犀利的学术目光、周密有序的考证章法,以及精细详备的资料搜录。

第一,体例明晰,纲目犁然。

《摩石录》的研究论文叙次明晰,结构规整。内容大致遵循以下顺序:1.墓志和墓盖的基础信息(形制、尺寸、纹饰、书体、行款、碑面清晰完整程度以及现存地等);2.录文、标点;3.释读(对疑难词语、概念的疏解,以及相关史事的考证等);4.综合性研究;5.初步结论和推论。尤值一提的,是每篇文章末尾的分点结论归纳,使得论旨显豁,有助于未及详览该书的学者迅速了解每方墓志价值与作者研究结论。

第二,善于质疑,目光敏锐。

《摩石录》体现了作者出色的问题意识和敏锐的学术目光。正如复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专家组评《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所言:“作者具有自觉的‘问题意识’,善于从大量原始文献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尤能从无疑处质疑。”^①

^①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序第2页。

例如,《李百药墓志》记其迁葬一事,引述四位古人的事例作为支撑迁葬的根据:“昔京兆杜预托邙山而建莹,河内张文相牛亭而卜地。长彦亲无反鲁,时贤谓之通人,季札子不还吴,元圣以为达礼。”作者认为,这一不起眼的细节,背后体现的是撰者心态和时代风气。因李百药不归葬故里而迁厝长安的行为正处于时代新旧风俗的交替之际,故当其以这种隐晦的方式强调迁葬行为的合法性时,反而凸显出其可能面临的礼仪争议,实则暗含辩护意味(页 120-122)。又如,《邵建和墓志》中提及唐代不同时期刻工多人,几乎可以构成一部唐代石刻工简史纲要,唯对同时的天水强氏家族的刻工不著一字。作者揭出这一细节,认为两个家族成员互相合作镌刻过不少石刻,应该互相了解和往来,而邵氏墓志不提及,是因为技艺行业同行为敌的陋习,还是别有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页 187-188)。再如,回纥墓志一文通过比较五方回纥墓志,发现唯《回纥琼墓志》记其信息曰:“姓回纥,字琼”,仅书墓主表字,名姓均缺漏。对此作者提出,隋唐时期昭武九姓及归化的西域诸族,石国人以石为氏,米国人以米为氏,史国人以史为氏,在在不少,唯以回纥为氏者仅见此一例,是撰碑文者疏忽还是有意为之,待考(页 292-293)。通过以上例子,不难见出作者从细微处发现问题,从点滴中窥见端倪的学术眼光。

第三,考释精审,周密有序。

在对于墓志关键词句的考释中,《摩石录》彰显了严谨的态度与有序的章法。其步骤大致有三:1. 对词语含义进行溯源;2. 引述相关文献佐证;3. 举出相近或相同时代的文献相印证。如,在探讨李百药迁葬问题之前,文章首先对志文中

“迁厝”一词的准确释义进行考证,先引《颜氏家训·终制》:“先君、先夫人……旅葬江陵东郭,承圣末,已启求扬都,欲营迁厝”,次引《南史·孝义传下》:“(沈崇儻)家贫无以迁厝,乃行乞经年,始获葬焉”,最后引骆宾王《上吏部裴侍郎书》:“藜藿无甘旨之膳,松楸阙迁厝之资”,从而得出结论:古时习惯上是将“迁厝”作为改迁归葬的替换词,与“权厝”“暂厝”的用法是有差别的,遂廓清这一墓志常用词语的含义(页 139)。又如,考释《宗氏夫人墓志》中“少康祀夏之典,中令缉熙”的“缉熙”一词,依次引《诗·大雅·文王》毛传中“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诗·周颂·敬之》郑笺中“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班固《典引》中“宣二祖之重光,袭四宗之缉熙”、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并文明自天,缉熙景祚”以及李邕《赠安州都督王仁忠神道碑》中“缉熙远略,绳准嘉言”,方释其义为:“指光明,也可引申为光辉”(页 157-159),足称引证完备、周密有序。以上均不难见出《摩石录》于传统注释工作上重视证据与法度森严的特点。

第四,搜录精详,嘉惠学界。

《摩石录》重点研究的九方墓志,均是随论文发表首次公布于世。故作者撰文时,以诚挚恳切、不遗余力为学界贡献新材料的态度,汇合旧说新见,做了很多细致的搜录工作。例如吐谷浑成月公主墓志一文,首先简要介绍吐谷浑研究的重要学者和著作(页 197-198),继而引述吐谷浑慕容王室出土墓志基本信息列表(页 198-202),最后附录与文章相关的吐谷浑大事记(页 227-229)。再如祖孝孙墓志一文,结合墓志与传世文献列出祖孝孙的生平履历简表(页 57-62)。又如双语安优婆姨塔铭一文,开篇即对西安及周边新出土的

北朝至隋唐双语墓志作出简要梳理,以列表的形式展示五方双语墓志的基础信息,并对包括《安优婆姨塔铭》在内的三方粟特文汉文双语墓志加以简介与分析(页 235-238)。又如邵建和墓志一文,吸收前人成果为志中所涉朱静臧、史华、徐思忠、卫灵鹤、郑振、陈英、常无怨和杨暄八位唐代石刻名家逐一编辑词条,形成自初唐至邵建和时代石刻名家的简要排行谱(页 188-194)。诸如此类,均为相关专题的继续研究提供了资料线索和学术信息,为学界贡献了高水平的“熟文献”。

四、余论

《摩石录》考论精彩,创获良多。由于书中所涉问题繁难,故仍存在一些细节可以进一步讨论,笔者就阅读所感,略陈浅见于下。

首先,细读全书后,笔者对个别具体结论产生了些许疑问,谨此向作者及学界先进求教。其一,是成月公主生母问题。目前史传及学者的研究仅提及慕容诺曷钵有三子,《弘化公主墓志》则记有“嗣第五子右鹰扬卫大将军”,《成月公主墓志》又谓公主为“吐溶(裕)浑可汗国王慕容钵第二女”,作者据此考知诺曷钵至少有五男二女,论证并无问题。接着,作者推断道,诺曷钵娶弘化公主一般谓贞观十四年(640年),《弘化公主墓志》则曰“贞观十七年出降于慕容诺贺钵”,则“即以最新的贞观十七年来说,十八年生长女,十九年生长女也是正常现象,据此来看,成月当为弘化公主所生。”(页 208)成月为弘化所生的结论不知如何得出,据文中所给材料,未见有更直接的证据以坐

实。其二,是成月公主入寺修行的原因问题。作者通过比较《成月公主墓志》和《法澄塔铭》,认为成月公主入寺修持“要么是一种坚定的信仰,要么就是一种处罚”(页 218)。这一观点似未见清晰的推断过程,不知背后是否有更详细的依托。

其次,书中抉出了众多有价值的细节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笔者不揣拙陋,联系所见材料,试就其中几处作一些引申。

其一,是《回纥琼墓志》不书名姓问题。该志名姓缺漏,仅书表字,这在目前所见的回纥墓志中是孤例(页 293)。仔细分析,这一现象的特殊之处有二:一、该回纥贵族以回纥为姓,实属罕见;二、北朝隋唐墓志中屡见不书名、字之现象,叶炜《试析北朝隋唐墓志文中的不书志主名字现象》也说明,北朝隋唐墓志中无名有字现象为数不少^①,但《回纥琼墓志》是直接将名省去不提,与常见的“讳○”空格形式非为一类。据学者研究,从南北朝开始,“以字行”风气较盛,人的名与字往往混淆,以字行于世者比比皆是。^②那么,回纥琼志仅书表字,是否与这种“以字行”的称谓风俗有关,抑或是出于避讳的考虑,有待进一步探讨。

其二,是《李敬族墓志》《赵兰姿墓志》夫妻墓志中对宗教信仰描述的差异,与墓志书写习惯乃至社会观念之关系问题(页 134-136)。《李敬族墓志》仅赞其儒学和阴阳术数方面的素养,《赵兰姿墓志》则极力颂扬其信奉佛教的虔诚。陆扬认为,这种差别更多是由书写习惯与社会价值取向所致,并非完全符合志主思想的真实情况,因而

①叶炜:《试析北朝隋唐墓志文中的不书志主名字现象》,《唐研究》第23卷,2018年,第370-470页。

②关于“以字行”的称谓风俗,可参看范志新:《“以字行”考略》,《厦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聂淑萌:《唐初元勋的家族历程:以〈李药王墓志〉与李靖家族为中心》,《唐研究》第17卷,2011年,第179-198页。

“虽然李敬族的墓志里未提他是否信佛……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得出李敬族不信佛的结论……两方墓志非但出于同一人之手,而且作者李德林是精英文化的代表性人物,所以就更说明作者对男女的侧重不同在哪里。”^①而作者似乎更倾向于相信志文描述的真实性:“中国古代士人,思想相容并包,儒释道互补……较少一意孤行走极端。反倒是家庭女性,容易把思想与信仰不断践行,不断强化而成某种鲜明特色”,并从反面思量:“学者以碑志体例为由,推广为李敬族亦奉佛,或有些过于简单化”。陆氏与作者从两种相对角度认识这一现象,或可相互补益,彼此参照。至于,究竟应该如何认知这种宗教信仰描述的性别差异与志主思想、书写习惯及社会文化价值观的真实关系,以及如何在墓志书写演变的大框架下赋予其准确的定位,还需要立足大量的样本作详细全面的考察。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赵兰姿墓志》对其修行实践的描写,亦可对应到北朝隋代在家女性墓志信仰书写的习惯。郑雅如在《理想人生的新向度——北朝隋代在家女性墓志中的信仰描述》^②中,详细分析了四十篇在家女性墓志的信仰描述,总结出若干书写策略,其中便包括引《赵兰

姿墓志》为例证,比如“蔬食洁斋卅余载”的茹素行为、“凡见贫困,常必施贍”的布施作为、“垂恩贱隶……未尝捶挞”的仁慈待下,均意在显示志主的慈悲精神,是墓志对在家女性形象惯常的理想建构。再有,郑氏亦注意到“四十篇信仰入志的女性墓志文,提及的信仰皆以佛教为主,几乎未见其他宗教信仰的描述”,是以推测佛教信仰在当时社会更具出众地位,故被借以凸显志主高尚的处世态度和人生追求,其他信仰则被撰者策略性地剔除。陆文与郑文所触及的文本范式、书写策略与文化理想等角度,对深入理解墓志信仰表述是十分关键的,研究者应当予以关注。

其三,是《李百药墓志》呈现的其思想世界的问题。作者指出,志文中“情忘宠辱,心混是非”的表述“不过是盖棺后冠冕堂皇的表扬话”(页145),理解准确。而这一表达仍可与墓志书写模式乃至时代思想风气联系起来。陈弱水曾以大量墓志为考察对象,发现唐前期墓志中大量存在一种模式化的书写内容,即对志主思想中儒与玄、出世与入世两方面的赞语并置出现,如“研精孔墨之场,放旷老庄之囿”^③、“播芳声于□海,腾妙响于九皋;志存名教之中,性远风尘之外”^④等。由

①陆扬《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为中心》一文写到:“中古墓志中对女性的宗教取向和实践往往不加遮掩地加以表彰,而相对来说对于男性在这方面的追求则要隐晦很多。这当然不表示在实际生活中男性对于宗教的热情比女性低,而更多的是受书写习惯的制约……背后隐隐有某种社会观念的运作”(载《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5-21页。)

②郑雅如:《理想人生的新向度——北朝隋代在家女性墓志中的信仰描述》,《早期中国史研究》第10卷,2018年第1期,第1-90页。

③周绍良、赵超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上元〇二六,《□□□□□□□□□□君墓志铭并序》,第611页。

④周绍良、赵超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圣历〇〇八,《大唐故雍州新丰县令朝议郎上柱国司空府君墓志铭并序》,第366页。

此,陈氏提出唐代前期的士人思想世界具备一“二元世界观”特征,即,认为世界由两个领域构成:一是社会(包括政治)和家庭生活,一是个人生活精神追求。前者的指导原则是儒家思想,诸子百家、文史知识也包括在内;后者则以古典道家、玄学、佛教、道教为主要资源。前者是求知治世的凭借,后者则帮助体会宇宙人生的真谛。^①陈氏从思想史研究角度出发,认为墓志中这种类型化的赞语,虽未必是对志主思想的忠实反映,却是当时普遍文化理想的表露,可资探测时代思想的特征。再回看《李百药墓志》关于其思想的完整描述:“振民轨物之治方,体国经野之政术,茂陵魏家之逸篇,三雍七郊之礼典……对鲁国之坟羊,多识亚于尼甫;辩汉世之豹鼠,博物逾于子云……常诫满盈,追魏舒之逸轨,每怀丘壑,重樊英之芳风。抗表归闲,挂冠辞禄。青春韶景,开筵招三益之宾……情忘宠辱,心混是非。玩庄周之七篇,歌荣期之三乐。保名全誉,树德立言”(页118)显然,这正是一种典型的“二元”赞颂模式乃至“二元世界观”的反映。此外,墓志并述李百药学识广博(见“振民轨……博物逾于子云”一段),这和陈氏论文总结的另一现象吻合,即,唐代前

期墓志中多存在对志主学术思想多元化的类型描述,志主学识每每强调其广,罕见“纯”的观念,儒家的正统地位并不鲜明。陈氏认为这或与唐前期士人看重博学的心态相关。^②故《李百药墓志》又可看做这种多元化书写方式的一例。综上所述,无论陈氏所言的“二元世界观”与推崇广博的文化理想是否真实存在,至少能知“二元”乃至“多元”的赞词,是唐前期墓志中的习见表述,《李百药墓志》当为其中一代表。

以上是笔者对于本书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不当之处尚祈作者及前辈同仁指正,所涉诸多细节,也期待学界日后做出更加深入的解读。

单方墓志包含的信息是支离零散的,有时甚至不足以反映历史的某个侧面。《摩石录》则综合各方材料,借助众多“历史的碎片”,成功地构建起通往中古社会真实现场的路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碎片性史料的充分提取、准确还原、多维解读和深度透视。笔者有理由期待,随着《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整理工作的不断推进,李浩先生及其研究团队将为学界贡献更多的新材料与新成果,进一步拓展唐代文史研究的新空间。

^①陈弱水:《墓志中所见的唐代前期思想》,《新史学》第19卷,第4期,第1-28页。

^②陈弱水在《墓志中所见的唐代前期思想》中认为这种广博可能仅是一种观点而非实际:“不过个人怀疑,当时士人学问的广度,跟其他时代未必有太大的不同。广博可能基本上是观点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唐前期的学术场域,诸流奔竞,相对而言,儒家的正统地位不鲜明,再加上此时士人文化具有贵族性格,重视个人的学养才艺,‘广’的面向就突显出来了。”

西北大学国际汉唐学院简介

西北大学国际汉唐学院，是经国务院批准、陕西省教育厅发起成立，西北大学主导成立的无行政级别实体机构。

2016年8月底，陕西省自贸区获批，其中“打造面向一带一路的人文交流新高地”和“探索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新模式”为陕西自贸区的特殊亮点。2017年3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提出创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新模式，在自贸试验区内设立国际汉唐学院。“西罗马，东长安”，西安曾经是联结欧亚大陆的通道“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当今中国最具活力的内陆新特区，新欧亚大陆桥中国段最大的中心城市。学院依托陕西省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引进国际国内知名大学、文化机构联合办学，推动国学、中医、茶道、武艺、戏曲、书画、礼仪、音乐、服饰、工艺等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走进来”。学院致力于与国内外大型教育、文化机构开展战略合作，通过内外结合、产学研结合，颂扬中国传统文化之优，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之美，丰富中国传统文化之雅，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之致。依托“十三朝古都”的丰厚文化底蕴，发挥陕西自贸区的独特区位优势，共享文化资源，拓宽传播渠道。此系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坚定文化自信、创办陕西“国风、秦韵”传统文化品牌的重要举措，对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丝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提升和完善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培养培训体系，实现国外有“孔子学院”，国



内有“国际汉唐学院”的中国文化交流传播大格局起着积极地推动作用。2021年1月29日，陕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通过了《陕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要提高对外人文交流合作水平，持续发挥国际汉唐学院作用，推动“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建设。

国际汉唐学院的建立，是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多元文化理解与包容的重要举措。习总书记两次来陕考察作出重要指示：“要切实加强文化建设，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保护好陕西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陕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要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外货物在陕西集散，中外文化在陕西交融，中外智慧在陕西碰撞”。学院贯彻落实习总书记指示，自觉承担起陕西文化发展和对外开放交流的责任，对于提升和完善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培养培训体系，构建中国文化交流传播新格局起着积极地推动作用。

自成立以来,国际汉唐学院秉持“开放、交流、互鉴、传承”的理念,致力于为海内外受众提供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与产品,完成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如以项目为托,将设立全球第六个全方位资源支持的高端文化项目——中国文化博士项目,旨在培养青年汉学家,共同繁荣汉学研究,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致力于“一带一路”国际人文双向交流高端平台建设。此外还推出了国际汉唐学院短期学者访问奖学金,研修架构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专题讲座+教育培训基地考察”为基础,旨在为汉学家们提供项目支持和研究帮助,增进学者对中国优秀文化深入了解,促进中外学者汉语教学经验交流与合作。

同时,依托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优势,积极推动建设贯通中亚、西亚和南亚的线上、线下人文交流基地,继续打造“平台+”概念,采取“平台建设+项目运作+分批推进”的新模式。为弘扬和

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讲好汉唐故事,讲好陕西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为了使国际汉唐学院在我省教育对外开放事业中发挥创新和引领作用,更好地发挥其社会效益,经过两年的探索与实践,国际汉唐学院积极发挥人文交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目前已经成功举办十余项高端中外人文交流活动,其中包括:首届中华人文精神国际学术研讨会、陕西省首届国际学生文化艺术节、陕西省中外人文交流活动周暨陕西省国际学生文化艺术周、陕西省首届高校国际模特大赛、“中印建交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第六项、第七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展览项目”——国际玄奘论坛暨东方智慧绘画艺术展、国家汉办汉语教师培训项目、“一带一路”国家中华文化高级研修班、丝绸之路艺术教育国际论坛、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中国文化体验课程、乍得农业部农业发展研修班中国文化体验课程等。共计有来自50多个国





家、140 余名中外知名学者和近 1000 人次的国际学生积极参与其中。

国际汉唐学院在陕西省委外事办公室、陕西省教育厅和西安市委外事办公室的大力支持下，自 2019 年起积极筹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系列培训课程。课程以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西北大学原校长张岂之先生提出的十二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为依据，分为天人之学、道法自然、居安思危、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厚德载物、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等十二个模块，组织省内外文史专家师资团队，打造精品系列专题讲座。陕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系列课程依托我省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以文化遗址现场教学为特色；面向全国涉外干部和国际友人，量身定制；以沉浸于大遗址文化环境的方式，使学员亲临现场，亲身体验、感悟中华传统文明的脉络和细节，把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汲取宝贵的思想资源，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广为人知、真为人懂、深为人信。并积极对接了陕西省内十二处名胜古迹作为核心理念教育基地，其中包括陕西华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博物院、汉景帝阳陵博物、西安昆明池公园、宝鸡周原博物院、黄帝陵管理局、西安城墙管



委会、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张载祠、延安革命纪念馆、楼观台、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等。

学院与韩养民教授等专家合作“汉唐文化故事”项目，撰写《汉唐盛世文化交流的故事》，目前已完成初稿，共计 8 万 5 千余字。录制《COVID-19：中国与世界》系列音频 15 集，为国际学生量身打造中英双语专题音频节目，对新冠肺炎有关知识进行科普，讲述疫情期间的感人事迹，以及中外各国媒体在疫情期间的报道与交流。并且推出了新媒体平台科普项目：拍摄以绘画、文物或汉唐武术艺术为载体的有关汉唐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科普类视频。与西影集团合作拍摄岳钰教授简介和画展宣传视频——《求真求实的“癡痴坊主”》《用绘画告诉你学术道理—东方智慧·长安人》。目前中文版、英文版、俄文版已制作完成，并在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B 站、一点资讯、西影视频、好看视频、抖音等各大媒体平台发布。马文国教授的汉唐武艺系列影片脚本正在积极筹备当中，预计 2021 年 7 月前完成取景拍摄及后期制作。同时还将继续打造国际汉唐学院演艺团队，以陕西省留学生和陕西省年轻艺术工作者为主体，制作高端精品文化系列节目，力争全方位展现汉唐盛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宋明文学专家——张文利



张文利,女,1968年7月生,陕西凤翔人,中共党员,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1986年毕业于陕西省凤翔师范学校,获初中专文凭。1990年、1994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先后获得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学位。1994年7月分配至西北大学任教至今。2003年于陕西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2004年至2007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其间2006年至2007年在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做访问学者。学术兼职有词学学会常务理事、宋代文学学会理事、散曲学会理事、杨万里研究会副会长等。

张文利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尤其致力于宋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方向:

一、理学与宋代文学研究

张文利教授在该领域的第一个关注点是理学与宋诗的研究,其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为《理禅融会与宋诗研究》。该研究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切入,考察宋代理学与禅学的交相融会及其与宋诗学理论和宋诗创作实践的关联。研究标举“理禅融会”这一核心范畴,指出由此形成了宋代文化的新特质,主要体现为治心养气的心性涵养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体悟内省的思维方式和平淡恬静的审美观。研究着重从宋人的诗道观、诗歌艺术思维特征、诗歌表现内容的加强与侧重以及以平淡、老成、古雅为主的诗歌境界诸方面,探析理禅融会下的宋诗学,并以此为理论基石,对宋诗进行个案分析与研究。该项成果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出版发行,受到学界的关注和好评。《光明日报》《西北大学学报》《宋代文学研究年鉴》刊登书评予以评介,获评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张文利教授在该领域的第二个关注点是宋代理学家文学研究。魏了翁是南宋后期继朱熹和陆九渊之后重要的理学家,其理学融合朱陆,文学创作丰富,寿词数量居两宋之冠,很值得关注。张文利教授的《魏了翁文学研究》首次从文学史的视野观照魏了翁的文学世界。全书无论是对鹤山交游的考索、学术思想的阐发、还是对鹤山与西山先生真德秀的比较,都以文学为聚焦点。书中主体部分在文本细度的基础上,倾力对鹤山的诗、词、文进行全面梳理和深度阐释。全书学术史视角、问题意识与原始文献并重,文献学研究、

理学研究和文艺学研究相结合,在史料考信的过程中抉发文本中的幽光与寄意。该项成果对于深化宋代理学与文学研究颇有助益,获得西安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此外,还发表有《二程的文学观念及文学创作》《宋代理学家的傍梅读〈易〉》等论文。

张文利教授在该领域的第三个关注点是宋代书院与宋代文学研究,她主持的《宋代理学与文学关联性研究——以书院为中心的考察》的选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该项目引入公共空间理论,阐释宋代书院的教育价值和文化意味,着重揭示宋代书院与宋代各体文学的关联。发表有系列论文如《宋代吟咏书院诗》《理学视域下的宋代书院记》《书院与宋词》等。

通过文学、哲学、教育学等诸多视角,张文利教授力图全面深入地探究宋代的理学与文学,力争在这一领域有更多的创获。

二、词学研究

在词学研究方面,张文利教授首先对宋代理学家的词学观念和词创作做系统梳理,论文《论宋代理学家的词及理学对宋词的影响》认为宋代理学家们的词创作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但宋代并不存在理学词派。理学和宋词的关系,不仅体现为理学家对词创作的染指,更有理学对词的深层次影响。在词学观念上,理学的浸染,使得文人学者对词的品评出现道学气;在词的创作上,宋人以理入词,扩大了词体的表现畛域,强化了宋词的哲理色彩,促进了宋词的雅化。该论文获评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论文《辛弃疾与陈亮“鹅湖之会”之重估》认为,“鹅湖

之会”对辛弃疾和陈亮的词创作影响不大,也算不上是稼轩词派形成的标志性事件,对它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应持客观评价。论文《论魏了翁的以理入词》《鹤山寿词考述》对理学家魏了翁的词做了专题考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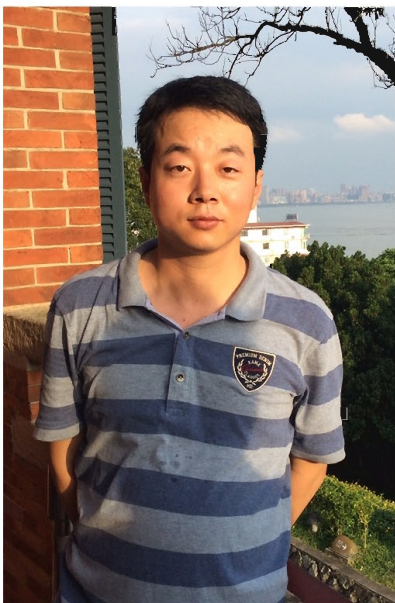
其次是对宋词中的城市书写做系列探究。论文《宋词中的双城叙事》通过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对宋词中的汴京和临安都市意象加以对比研究,探究历史的兴亡盛衰与城市文学形象的关系。论文《宋词中的长安书写》则以唐诗中作为帝都形象的长安与宋词中作为西北边防重镇的长安做比较分析,在对比中彰显宋词中长安意象的文化符号价值和政治象征意味。

三、唐宋转型与宋代文学研究

近年来,张文利教授重点关注唐宋转型与宋代文学的研究,所主持的选题《唐宋转型与宋代的家风、家学及文学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她认为唐宋转型造就了宋型文化,催生了宋代的新士族,新士族的家风、家学的新特质,成就了宋代文学的新面貌。本课题的阶段成果如《新世纪以来唐宋转型视域下的宋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宋代家训诗研究》《宋代家训中的治生理财》等陆续推出,为学界所关注。

此外,张文利教授还对宋明时期的陕西古代地域文学有一定研究。参与撰写《陕西古代文学史》著作,完成陕西省社科规划课题《苏轼关中时期文学研究》、陕西省教育厅重点基地项目《宋代的陕西文学研究》,出版著作《苏轼在关中》,发表《李復的文学观念及文学创作》《论康海散曲创作与关中地域文化》《论王九思和康海对王兰卿的书写》等论文。

唐史及敦煌学专家——李军



李军,男,1979年6月生,河北肥乡人。2003年,本科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3年考取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历史文献学(敦煌学)专业硕士研究生;2005年通过“提前攻读”,转为历史文献学(敦煌学)专业博士研究生;2008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兼职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中国历史文摘》主编、《唐研究》编委,陕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人文与新闻传播类工作委员会委员、秘书长。

先后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早期中国史研究》等海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

部社科项目等课题5项,获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5项。先后入选西北大学“优秀青年学术骨干”支持计划、陕西省“普通高校青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陕西省“特殊人才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陕西省“六个一批”理论界人才、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等人才项目。

李军教授主要从事隋唐史暨敦煌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唐宋之际西北区域史”与“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两个领域。

一、唐宋之际西北区域史

李军教授利用敦煌文献等材料,在很大程度上复原了唐宋之际西北地区政治形态演变的历史面貌。在《清抄本〈京兆翁氏族谱〉与晚唐河西历史》(《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一文中,李军教授利用其本人所揭出的清抄本《京兆翁氏族谱》为核心史料,通过梳理河西军政长官翁部的仕宦经历以及河西概念的演变等内容,展现了晚唐河西军政机构的基本运作情况及形态演变轨迹。《晚唐政府对河陇地区的收复与经营——以宣、懿二朝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一文复原了唐中央政府及张议潮收复河陇陷蕃失地的具体进程,并通过对传世文献的系统梳理,展现了中央政府在河陇地区析置藩镇以削弱归义军的经营策略。《晚唐政府对河西东部地区的经营》(《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探讨了晚唐政府对河西军政机构的设置及调整情况,在学术界首次清晰地梳理出了晚唐凉州节度使向河西都防御使及五代时期河西

节度使转化的过程。《晚唐凉州相关问题考察——以凉州控制权的转移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则以凉州的控制权为中心,探讨了唐政府、归义军及凉州嗝末等政治力量在河西的活动情况。《再论张议潮时期归义军与唐中央之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1期)探讨了张议潮统治归义军时期,归义军与唐中央政府之关系的动态演变过程。相对于以往,上述研究并未将河陇等地域视为与中央相隔离的封闭区域,而是将其置于大的政治变局中考察,故得出了不少新的结论。

二、出土文献(敦煌文献、石刻资料)的整理及研究

李军教授主要利用以敦煌文献、石刻文献为代表的出土文献,对唐代政治史进行了积极的新探索。其中,《北门禁军与武德九年玄武门政变之关系考辨——以常何为中心的考察》(《早期中古史研究》第8卷第2期,台北:早期中国史研究会,2016年12月)通过复原李世民玄武门之变的筹划及实施过程,并对政变功臣的碑铭进行全面考察,证明北门禁军的将领并未深度参与这场政变。以此为基点,将促使学术界重新审视陈寅恪先生所创设的“北门之说”。《新出李宽碑志与唐初政局》(《东岳论丛》2018年第3期)利用唐初重臣李宽的神道碑及墓志铭,探讨了李宽与唐朝经略西域、征伐高句丽、创建东都留守制度等重大举措之间的内在联系。《甘州回鹘建国前史钩沉》(《中国中古史集刊》第3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通过将敦煌汉文、

古藏文及于阕文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方式,对学术界存在很大争论的甘州回鹘渊源问题进行了探讨,证明其应源自安西回鹘内讧后分离出来的回鹘散众,而安西回鹘的分裂对唐宋之际西北地区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州七关的收复与唐宣宗大中政局》(《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0期)主要利用白敏中碑志、《刘德训墓志》等石刻资料,在复原唐宣宗经略三州七关具体进程的基础上,揭示了具体军事经略与唐朝政局之间的内在关联。

李军教授对晚唐五代宋初的西北区域史进行了贯通式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传统历史断代的影响。通过打通唐宋时代界限,有助于学术界更为准确地把握唐宋之际西北地区历史的发展脉络。其利用最新出土的石刻文献,对唐代政治史所进行的新探索,则克服了传世史料记载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为唐王朝的治乱兴衰提供了新的解释,也可以为当今时代的治国理政提供难得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此外,李军教授还积极参加并组织海内外学界的学术交流活动,多次应邀赴英国、韩国、俄罗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参加以隋唐史、丝绸之路、敦煌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先后受邀为台湾地区的中正大学、中兴大学、台北大学、中国文化大学、淡江大学的师生做隋唐史及出土文献研究方面的学术报告;先后联系气贺泽保规、雷家骥、王明荪、林冠群、金相范等海外学者来校讲学,积极推动中国中古史学界的对外学术交流。

新书推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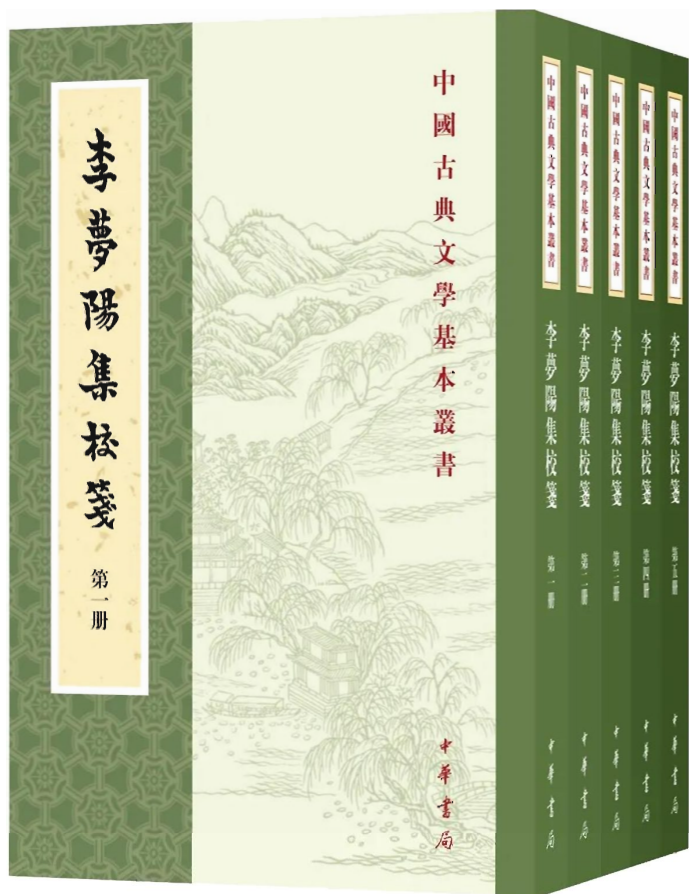
◆《李梦阳集校笺》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古典文献学专业学科带头人郝润华教授的《李梦阳集校笺》(全五册)于2020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该书严格遵循古籍整理的方法、原则和规范,对李梦阳别集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具体包括辑佚、点校和笺注。该书整理采用全式校点的方法,为全书180余万字中的人名、地名、书篇

名等,加标专名线,实属不易。此书校勘也很细致精审。书中费力最多的是对李梦阳诗文作品的写作年代、创作本事作出深入考证笺释,对其中相关的人名、地名、职官、史实等作了较为详细的笺注,同时,也纠正了前人注释李梦阳作品中的某些错误,为李梦阳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而重要的信息。该书体例周详,资料齐备。全书分为前言与凡例、正文、补遗与附录四部分。前言部分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李梦阳生平、交游、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及历代《空同集》的编辑、流传、版本等进行了详细的考述。正文部分依底本原貌,将全书分为六十六卷,依诗体、文体编排,诗文后附“校勘记”“笺注”与“集评”。补遗部分共辑录出不见于《空同子集》六十六卷底本中的作品共计诗六十九首,文九篇,均标明出处。附录部分包括李梦阳生平传记资料、诗文集历代序跋与版本题跋记、书信及赠答酬唱诗等四部分。

此书一经推出,受到学者们的高度赞誉,被广大读者评选为2020年度读者喜爱的中华书局十佳图书(古籍学术类)之一。郝润华教授费心十八载的整理成果,是填补李梦阳研究领域尚无一部李梦阳诗文集整理本这一空白的力作,必将对李梦阳研究和明代文学研究产生极大的影响。



◆《京兆集——半通斋诗选二集》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诗词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会长刘炜评的《京兆集》于2021年1月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发行。

该书是作者继《半通斋诗选》之后的第二部诗词选集，收录近十年来的诗词作品800余首，体裁包括格律诗、古风、歌行、词、曲等，众体兼备，蔚为大观。内容广博，诗句或雅正庄严、沉郁劲健，或洒脱不羁、戏谑婉讽。在其笔下，浮生百态尽可入诗，客观描写与诗性演绎并存，炽情感性与逻辑之美俱在，襟怀坦荡，腔血可感。

《京兆集》由著名古典文学专家薛瑞生、陕西省诗词学会会长孟建国、青年学者陶成涛作序。此书一经推出，受到学者们的高度赞誉，孟建国总结刘炜评诗词的特点为“情真、意深、语新”。西北大学教授费秉勋评价：“刘炜评写旧体诗，诗思滂沛，笔意畅达，每题既立，动辄十首八首。倜傥风雅，恣肆通脱，今情古意，跃然纸上。”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刘毓庆认为：“炜评君诗，无一空言，无一虚言；心直口快，有放矢之的；沥血披肝，无造作之态。行吟于历史峡谷之中，放歌于燕市行迈之间。如幽燕老将，有沉雄勇决之风；如西京才子，有风流倜傥之姿。”著名作家方英文的感受是：“诗人取材宽广杂碎，庄子宇宙，杜甫春韭，只要来了感觉，一概



入诗，且每成佳构。”南京大学教授周晓陆谓《京兆集》“是一部留待后人品评、研究的文字；文学也好，世情也好，若干若干年后，足以回映当今”。

刘炜评教授长期从事古典文学教学和散文、诗词创作，视野辽阔，才情充沛，诗笔自由。其作品既根植传统、典雅蕴藉，又立足当下、与时俱进，深切吟咏时代变化与古今悲喜，具有强烈的可读性和感染力。